碑與帖的交會－
錢泳《攀雲閣帖》在清代書史中的意義

盧慧紋*

【摘要】本文以清代書法家錢泳（1759－1844）主持刊刻的《攀雲閣帖》作為研究主題，探討嘉、道時期書家如何統整乾、嘉金石學者積極訪碑、考碑與校碑的成果，使其成為有系統且易於入手的書法學習典範。這是第一部以漢隸為內容的大規模刻帖，標誌著碑版石刻正式被納入書學體系中，在中國書史上極為重要，然至今尚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本文除考察《攀雲閣帖》的版本、內容、選件、臨書風格與編集原則，也從明清的書法臨古與刻帖、嘉慶至道光初期「金石學」、「碑學」與「帖學」交會的時代脈絡，還有此帖由十八世紀末至二十世紀的多種化身，來考察它在清代書史中的意義。

關鍵詞：錢泳、攀雲閣帖、金石學、碑學、帖學、漢碑大觀

前言

本文以清代書法家錢泳（1759－1844）主持刊刻的《攀雲閣帖》作為研究主題，探討嘉、道時期書家如何統整乾、嘉金石學者積極訪碑、考碑與校碑的成果，使其成為有系統且易於入手的書法學習典範。《攀雲閣帖》始刻於嘉慶十三年（1808），完成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內有錢泳臨漢（魏）碑刻書法54種，字跡清晰，檢閱便利，帖末有錢泳自識，謂欲以此為初學者典範。這是第一部以漢隸為內容的大規模刻帖，標誌著碑版石刻正式被納入書學體系中，在中國書史上極為重要，然至今尚未引起學界足夠的重視，相關研究付之闕如。錢泳如何選擇與詮釋風格多樣、尺寸相異、完缺程度不同的漢碑？他與

＊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助理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金石考證之學的淵源為何？與明清的書法「臨古」傳統有何關係？又，《攀雲閣帖》兼有「帖」的形式與「碑」的內容，在十九世紀叢帖刊刻蓬勃發展與碑學書法興起的雙重背景下，具有什麼意義？本文將針對《攀雲閣帖》的刊刻、內容及流傳作深入的考察，並旁及當時傳摹複製漢碑的其他模式，以呈現此帖在清代書法史中的意義。

一、錢泳與漢隸

錢泳，初名鶴，字立群，一字梅溪，號台仙、梅華溪居士，江蘇金匱（今江蘇無錫）人，以善書與鐫碑版聞名於清中期。錢泳生平與書學的相關文獻甚為豐富，除年譜及筆記文字外，還有大批的題跋與刻帖留存。① 錢泳生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卒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享年86歲。錢泳一生沒有取得功名，書法與鐫刻、臨摹的功夫成為他職業謀生的途徑，以此游於畢沅（1730－1797）、 斌良（1784－1847）等人幕中，也藉之與當時的金石學者及文士，如梁同書（1723－1815）、翁方綱（1733－1818）、章學誠（1738－1801）、黃易（1744－1802）、洪亮吉（1746－1809）、鐵保（1752－1824）、孫星衍（1753－1818）、阮元（1764－1849）與包世臣（1775－1855）等人交往。由於他的鉤摹技術精良，許多名士曾委之將自己的書法或家藏古今法書上石。錢泳一生所摹、所刻之帖近百種，皆記載於他的《履園叢話》與《寫經樓金石目》中，內容涵蓋銅器銘文、秦漢石刻、二王書跡、唐碑與宋元

① 目前得見之錢泳年譜有兩種，一為〔？〕穎編，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記早年事甚詳，惜乾隆五十四年（1789）八月十四日以後缺，收入陳祖武選，《乾嘉名儒年譜》10（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頁313-352；二為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錢泳出生，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卒止，首尾完備，末並有錢氏子孫記，收入陳祖武選，《乾嘉名儒年譜》10（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頁353-426。錢泳傳記見《（同治）蘇州府志》，卷112，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九年刊本）。由於長期遊幕在外，錢泳足跡遍及南北各地， 著有筆記多種記錄所見所聞，包括《履園叢話》、《梅溪筆記》、《熙朝新語》等。這些著述涉及朝政、社會風氣、各種民間傳說、書畫收藏鑒定、碑版摹刻等，史料價值極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明清書家作品等，成品則有縮本、雙鉤、單刻、叢帖等多種形式，② 最為人知者包括：〈經訓堂帖〉（為畢沅摹刻畢氏藏古代法書，1788－1789）、〈詒晉齋帖〉（摹刻成親王永瑆書法，嘉慶年間有多種）、〈清愛堂石刻〉（摹刻劉墉書法，1805）、〈松雪齋帖〉（摹刻英和藏趙孟頫書法，1809），及〈抱沖齋石刻〉（摹刻斌良集趙孟頫與董其昌書法，1819）等。③

錢泳經歷乾、嘉、道三朝，正是帖學書法極盛、碑學書法初興的時代，而他的書學經歷也充分反映了兩種書學傳統的交會。他的書法主要有兩類：一為翰牘體，主要追蹤二王與趙孟頫；一為金石碑版體，師宗漢隸與唐楷，旁及篆書。他對二者皆用力頗深，一生勤於臨寫，練就一手圓熟工整的書法。二王、趙孟頫以及唐楷，基本為晚明董其昌（1555－1636）以至清乾隆年間，普遍的書學典範；漢隸與篆書則是新潮流，雖在清初有一波流行，以傅山（1607－1684）、鄭簠（1622－1693）、石濤（1641－1718）等人為代表，然真正廣泛為人重視與學習須待乾隆晚期，是依附於此時期日益增多的訪碑成果而來的。錢泳對漢隸用功極深，《攀雲閣帖》可說是他大半生鑽研漢隸的成果，在進入此帖的討論前，有必要先了解錢泳學習漢隸的過程。筆者根據錢泳年譜以及題跋、時人記載等其他相關資料，將他一生對漢隸的學習與研究，分成「醞釀期」、「成熟期」與「傳播與影響期」等三階段：早年由明人隸書始，後轉向直接學習漢魏碑版，建立書名，在晚年則藉大量刻帖，宣揚自己對漢隸及其他金石書法的理解，影響甚至遠及海外，以下分別討論：

---

② 錢泳，《履園叢話》，卷9（北京：中華書局，1979）；《寫經樓金石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

③ 評者多讚賞錢泳摹刻精良。關於這些帖的內容與後人評價，見容庚，《叢帖目》，第2、3冊（臺北市：華正書局，1984）；第4冊（香港：中華書局，1986）；張伯英，《張伯英碑帖論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關於錢泳的游幕、刻帖，及書學相關活動，可參見陳雅飛，〈乾嘉幕府的碑帖風尚—以錢泳為視角〉，收入莫家良等編，《書海觀瀾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頁147-15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醞釀期」：約由乾隆三十七年（1772）（14歲）起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29歲）

據錢泳年譜記載，乾隆三十四年（1769）時他年僅11歲，五經四子書讀畢即習書法，日能寫數十紙。④ 14歲時父親見他喜好八分書，特意攜至同鄉吳氏家中觀看明代吳起讓（江蘇無錫人，活動於十六世紀晚期、十七世紀初期）的八分墨蹟，且倩工搨文，朝夕臨模，是其學習漢隸之始。⑤ 同年秋錢泳遊虎邱，在碑帖舖中購得漢魏碑十三通，體悟明人隸書去古已遠，歎道：「向所見吳起讓書者，是明人故習，了無漢法，不可學也。」⑥ 從此朝夕臨模，遂工漢隸。⑦ 錢泳17歲後寓居蘇州館塾，也是在碑帖交易興盛、出版業昌繁的蘇州學會了「鐫碑、刻帖、雙鉤、響搨、臨模」諸事。⑧ 乾隆四十四年（1779）錢泳21歲時，友人顧君辦皇差，錢泳以潤筆百餘金為之於御屏上寫隸書數千字，並刻隸書於玉山玉屏上，顯示當時他的隸書已有相當造詣；而他受此鼓勵更加肆力于隸書之學，著手考訂顧南原《隸辨》，收羅更多漢魏碑拓。⑨四十九年（1784）錢泳26歲時遷入同里陸紹曾（字貫夫，號白齋，江蘇吳縣人，活動於十八世紀中後期）家中任塾師，紹曾與其兩位兄長皆「精於賞鑒，圖書金石羅列滿前，每得一碑、一帖、一書、一畫，必與先生（錢泳）同參真偽以為樂。」⑩ 紹曾並善篆隸，錢泳曾向他學習八分書。⑪ 隔年（1785）

④〔？〕穎編，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頁323；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357，乾隆三十四年（1769）條下。

⑤〔？〕穎編，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頁323-324。《年譜》中稱此明代八分書家為「吳憲之，字起讓，工於八分，嘗寫韵集八分變體刻石」。萬曆年間的高攀龍（江蘇無錫人，1562－1626）曾讚譽同邑時人吳起讓的八分變體書，應指的是同一人，見高攀龍，〈書吳起讓八分變體卷〉，《高子遺書》，卷12，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⑥〔？〕穎編，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頁324。

⑦ 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357，乾隆三十七年（1772）條下。

⑧〔？〕穎編，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頁328。

⑨〔？〕穎編，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頁329。

⑩〔？〕穎編，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頁33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錢泳27歲，在書肆中無意間發現明末清初學者徐樹丕（字武子，號牆東，江蘇長州人，1596－1683）⑫ 雙鉤之〈熹平石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等段落殘字五百餘字，驚喜之餘親自轉摹刻石，搨數百本流傳海內，由此建立了全國性的名聲。⑬

---

⑪ 錢泳曾在《履園叢話》「耆舊」卷中記載：「陸白齋先生名紹曾，字貫夫，工篆隸書，精於賞鑒，余幼時喜八分，嘗師事之。」《履園叢話》，卷6，頁171。葉廷琯所撰之〈陸白齋傳略〉記其事甚詳：

> 「陸紹曾字貫夫，吳縣人，……晳而髯，博物好談論，廣蓄古書名跡，……自鐘鼎古文，下及八分、行楷，靡不研究，尤工八分。居恆混跡市廛，……默默若無能者，及叩以古文奇字、古隸偏旁之正　，沿流溯源，應之不窮，莫能測其蘊也。……尤善蠅頭細書，有人勒之盤盂几研以進御，純皇激賞之，一時聲價大重，學八分者多師之，八分之為蠅頭蓋自紹曾始。嘗自評曰：『吾書去古遠甚，惟規矩不欲稍溢，令得精紙良筆而為之，其工詎可量耶？』凡遇古碑，雖巉巖絕壁間，必攜乾餱，架木懸綆，手自搨摹，辨其漫漶。集漢魏六朝隸書碑文，依其行款寫為縮本若干卷，可補洪、婁諸家書及顧氏《隸辨》之漏。晚年尤好飛白，有《飛白錄》二卷。……」

見葉廷琯，《鷗陂漁話》，卷1，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同治九年刻本）。陸紹曾傳並見《（同治）蘇州府志》，卷110，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九年刊本）；震鈞輯，《國朝書人輯略》，卷7，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三十四年刊本）。

⑫ 徐樹丕傳見《（同治）蘇州府志》，卷88，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九年刊本）。

⑬〔？〕穎編，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頁334-335：

> 「八月二十日偶荅一友人步至元（玄）妙觀前，見書肆中明版《管子》十五卷，批點甚精，購以歸。次日批閱，書中有國初徐樹丕印記，其零星片紙上皆漢隸雙鉤，再三尋繹，知是熹平石經殘字，喜不自勝，因取洪景伯《隸釋》考之，皆與符合，凡得《尚書》〈洪範篇〉七十八字、〈君奭篇〉十三字；《魯詩》〈魏風〉七十三字、〈唐風〉三十一字；《儀禮》〈大射儀〉三十七字、〈聘禮〉廿八字；《公羊》隱公四年傳十八字；《論語》〈微子篇〉百七十字、〈堯曰篇〉三十九字；又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及博士左立姓名十八字，合五百餘字。課徒之暇，親自刻石，三月始成，遂搨數百本，散布通經之士，從此流傳海內。」

據年譜所記，後來翁方綱重摹熹平石經於南昌府學，李亨特摹於紹興府學，皆採用了錢泳此本；此外，如皋姜氏、吳門劉氏等皆從錢泳本再模，影響極深。此事亦見載於《履園叢話》，卷9，頁235。另外，東京國立博物館藏有錢泳舊藏〈宋拓漢石經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成熟期」：由乾隆五十二年（1787）（29歲）遊畢沅幕中起至嘉慶中期（約嘉慶十五年，1810）（52歲）

雖然錢泳在前一期已建立起善隸書的名聲，也以善摹、善鑒聞名，但他的活動範圍與視野，主要侷限在以蘇州為中心的江南地區。乾隆五十一年（1786）秋天，錢泳為河南巡撫畢沅（1730－1797）用蠅頭小八分書〈御製淮源記〉一篇，刻於端硯之腹以為貢，稱旨。⑭ 隔年（1787）即受畢沅延聘入幕抵河南，⑮ 開始了隨畢沅來往南北的幕中生涯，直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左右為止，前後大約四年。⑯ 這是錢泳研究漢隸生涯的重要轉捩點，他由此得見中原與北方的金石學者與碑拓收藏，在漢魏碑版的鑒藏領域獲得極大的進展。

畢沅（1730－1797），字纕蘅，一字秋帆，號靈巖山人，江蘇太倉人，是十八世紀金石學的核心人物之一。畢沅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進士，曾任陝西按察使、陝西布政使、河南巡撫、湖廣總督等職，治學甚廣，並留心各地金石材料，編著有《中州金石記》、《關中金石記》、《山左金石志》等書。⑰ 他禮賢下士，幕府中網羅了許多著名學者，與錢泳同時在幕中者即有孫星衍（1753－1818）、洪亮吉（1746－1809）、馮敏昌（1747－1807）等金石學者。⑱ 當時錢泳在畢沅幕中除為之摹刻所藏古代法書成《經訓堂帖》（1788－1789），並為之校勘《中州金石志》，檢點書畫文籍金石碑版，⑲ 他在這裡不

字〉一卷，卷首有絹本設色錢泳像及翁方綱隸書題「梅溪藏石經小像」一行，內有石經殘字宋拓九紙，每紙並有錢泳校讀，惜因此卷無紀年，不清楚何時入錢泳之手，參見角井博，〈宋拓の漢石經殘字—東京國立博物館新收「錢泳舊藏本」の紹介－〉，《MUSEUM　東京國立博物館美術誌》，No. 309（1976年12月號），頁4-15。

⑭〔？〕穎編，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頁362，乾隆五十一年條下。

⑮〔？〕穎編，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頁362-363，乾隆五十二年條下。

⑯ 錢泳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起應紹興知府李亨特（？－1815）之聘修郡志。〔？〕穎編，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頁366-367，乾隆五十六年條下。

⑰ 畢沅生平見史善長編，《弇山畢公年譜》，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同治十一年刻本）；並見張維屏輯，《國朝詩人徵略》，卷37，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十年刻本）；《清史稿》，卷120，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民國十七年清史館本）。

⑱〔？〕穎編，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頁363，乾隆五十二年條下。

⑲〔？〕穎編，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頁363，乾隆五十三年條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第一手接觸到興盛的金石學風與重要學者，也開拓了人脈。此後錢泳游幕多方，⑳ 來往南北各地，旅途中造訪金石學者、蒐集碑拓，累積了可觀的古篆隸書法材料。

錢泳在此時期最重要的一次旅程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山東之行。此年春夏之交錢泳北上入京，途中過濟寧，謁見黃易（1744－1802）。黃易堪稱乾隆後期最重要的訪碑學者與碑帖收藏家，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起任官濟寧二十餘年，在附近地區廣蒐古碑刻。濟寧歷來為漢碑重鎮，經黃易與當地士人的整理擴充後，古碑數量倍增，且受到良好的維護。黃易的重要訪碑成果包括發現嘉祥的武氏祠堂刻石，及整頓立於濟寧州學內的〈司隸校尉魯峻碑〉、〈北海相景君碑〉、〈尉氏令鄭季宣碑〉、〈執金吾丞武榮碑〉、〈郎中鄭固碑〉與〈廬江太守范式碑〉等漢魏碑刻。㉑ 他同時收藏包括〈熹平石經〉在內的多種海內罕見舊拓。㉒ 錢泳此行到了濟寧州學觀賞漢碑，包括立於戟門內的前述六碑，與嵌於明倫堂壁的小塊殘石；㉓ 親至嘉祥拜訪武氏祠堂遺跡，撰立〈清重立漢武氏石室題記〉，紀頌黃易等人的發現與保存之功（圖1）；㉔ 並在黃易收藏的古拓上留下簽題、跋、觀款或印記，就筆者目前所見有以下數種：

---

⑳ 錢泳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應紹興府知府李亨特（？－1815）之聘修郡志，五十八年（1793）隨李調任杭州；嘉慶元年（1796）館杭州督糧道張映璣（活動於十八世紀晚期）署；二年（1797）起館兩浙轉運使秦震鈞（1735－1807）署；嘉慶後期起至道光年間則出入江南馮馨、斌良（1784－1847）、張井（1776－1835）等人幕。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367、368-369、373、373-374、385、394。

㉑ 參見拙文，〈漢碑圖畫出文章—從濟寧州學的漢碑談十八世紀後期的訪碑活動〉，《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6期（2009年3月），頁37-92。

㉒ 關於黃易所收金石總目，見黃易，《小蓬萊閣金石目》寫本6冊，上海圖書館藏。

㉓ 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367-368，乾隆五十七年條下。

㉔ 中央研究院藏有此刻拓片，另外曾出版於傅惜華編，《漢代畫像全集》（巴黎：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1950-1951），圖209、2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易藏古拓	現藏地	與錢泳相關之簽題、跋或觀款	錢泳印記	圖版揭戴
1	熹平石經殘碑宋拓本	北京故宮	1.「熹平石經遺字。乾隆壬子（1792）夏六月金匱錢泳為小松司馬題。」（錢泳隸書簽題；楷書款）（圖2-1） 2.「憶自丙午歲（1786）㉕泳既得石經殘字樵之，即聞小松有此本，屈指七年，今日始得展觀，不勝欣幸之極。壬子（1792）六月錢泳。」（錢泳楷書跋）（圖2-2）	1.「立群」白文長方印二 2.「台僊曾觀」白文長方印一	《神州國光集》，㉖ 第4、6集；《蓬萊宿約：故宮藏黃易漢魏碑刻特集》，㉗ 頁56、59、61。
2	武梁祠畫像題字宋拓本（傳稱「唐拓本」）	北京故宮	1.「乾隆五十有七年（1792），金匱錢泳立群觀。」（錢泳隸書觀款）	1.「台僊曾觀」白文長方印一（圖版過小，識讀不易）	《蓬萊宿約》，頁100。
3	成陽靈臺碑	北京故宮	1.「立群」（錢泳楷書款）	1.「錢泳曾觀」朱文長方印一 2.「台僊曾觀」白文長方印一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㉘ 第1冊；《蓬萊宿約》，頁115、117。
4	涼州刺史魏君（元丕）碑	北京故宮	1.「乾隆壬子（1792）六月，錢泳立群觀。」（錢泳隸書觀款） 2.「乾隆乙卯（1795）臘月江寧張復純、金匱錢泳、崑山朱叔鴻、吳縣潘奕雋同觀。」（潘奕雋行書觀款）（圖3）	1.「錢泳曾觀」朱文長方印一 2.「錢泳私印」白文方印一 3.「台僊曾觀」白文長方印三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第2冊；《蓬萊宿約》，頁107、108、109。

㉕ 據《梅溪先生年譜》，此事發生於乙巳年（1785）。見前文。
㉖ 鄧秋枚編錄，《神州國光集》（上海：神州國光社，1908-1922）。
㉗ 故宮博物院編，《蓬萊宿約：故宮藏黃易漢魏碑刻特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㉘ 有正書局輯，《黃小松藏漢碑五種》，第1-5冊（上海：有正書局，19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5	幽州刺史朱君（龜）碑	北京故宮	1.「壬子（1792）夏日過小松司馬濟寧官齋，得觀所藏幽州刺史朱伯靈碑，因題其後。泳。」（錢泳行書跋）（圖4-2）	1.「錢泳曾觀」朱文長方印一（圖4-1） 2.「錢泳私印」白文方印一 3.「立群」朱文長方印一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第3冊；《蓬萊宿約》，頁119、120。
6	小黃門譙敏碑	北京故宮	N/A	1.「台僊曾觀」白文長方印一 2.「錢泳私印」白文方印一 3.「立群」朱文方印一（圖5）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第4冊；《蓬萊宿約》，頁122。
7	廬江太守范式碑宋拓本	北京故宮	1.「壬子（1792）夏五月過小松司馬濟寧官廨，獲一觀焉。錢泳題。」（錢泳行書跋）（圖6-1） 2.「乾隆庚子（1780）八月舟泊濟寧，於青齋同年官署獲交小松司馬。今乙卯（1795）十一月小松至吳攜此見示。同觀者江寧張復純、金匱錢泳、崑山朱叔鴻。水雲潘奕雋識。」（潘奕雋行書跋）（圖6-2）	1.「錢泳曾觀」朱文長方印一 2.「立群」朱文方印一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第5冊；《蓬萊宿約》，頁111。

在〈涼州刺史魏君（元丕）碑〉與〈宋拓廬江太守范式碑〉的拓本中，除壬子年（1792）的錢泳題記外，還有乙卯年（1795）潘奕雋（1740－1830）所書之跋，提及此年黃易攜帶拓本至吳地，見示同好，錢泳亦在同觀者之列，顯示黃、錢兩人情誼持續不斷。

除了金石方面的知識，錢泳受黃易重視的另一個、甚至最主要的原因，應是他鉤模的技術。錢泳此行曾為黃易雙鉤模勒「王孟端畫竹石刻」，錢泳的《寫經樓金石目》 中即記有此件，下注：「黃易藏。乾隆壬子（1792）六月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濟上，小松以此示余，屬為雙鉤勒石。」㉙ 而更重要的是錢泳與黃易兩人有共同收藏經驗的〈熹平石經〉。錢泳於1785年曾將徐樹丕雙鉤之〈熹平石經〉殘字刻石傳搨，他因此聲名鵲起，也加入了清代文士學者們積極收集、考據石經的行列。錢泳除在黃易所藏之殘碑拓片後題跋，亦受黃易委託模刻，《履園叢話》記載：

> （乾隆）五十七年（1792），余北行過濟寧 ，錢塘黃小松時為運河司馬，又藏有舊搨《尚書》〈盤庚〉五行；《論語》〈為政〉八行、〈堯曰〉四行。小松屬余并刻之，均為藝林罕見之寶。㉚

錢泳此次山東之行除謁見黃易，還由濟寧繼續北行過濟南，拜見了另一位重要的金石學者，也是黃易訪碑人際網絡中的要角－翁方綱（1733－1818）。㉛ 翁方綱善考據、鑑定碑版，他與黃易經常合作，兩人所進行的工作就當時全國的訪碑而言，是最具前瞻性與典範意義者。㉜ 錢泳此次造訪讓他親炙金石學領導人物，對最新的訪碑成果有所了解，並「新得山左諸碑約數十種」，㉝ 收穫豐富。

往後錢泳至少還在嘉慶五年（1800）拜訪過黃易一次。㉞ 十三年（1808）

㉙ 錢泳，《寫經樓金石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無頁碼。

㉚ 錢泳，《履園叢話》，卷九，頁235。錢泳模黃易藏本亦見載於《寫經樓金石目》，模本後有黃易記云：「此三段易所藏本，無微不肖，真名手也。嘉慶五年（1800）閏四月五日，梅溪過濟寧漢畫室，因記。錢塘黃易。」此段題記雖是黃易於1800年所寫，但有可能是追憶壬子年（1792）六月錢泳初見石經殘碑拓片並模勒之事。錢泳，《寫經樓金石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無頁碼。

㉛ 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368，乾隆五十七年條下。

㉜ 翁方綱為黃易新獲碑刻作考釋與鑑定，當他考碑遇疑問時亦要求黃易就近親探原碑、製作佳拓，進一步促使黃易獲致新發現，兩人的來往揭示了十八世紀訪碑與考碑相互牽動的關係。參見拙文，〈漢碑圖畫出文章—從濟寧州學的漢碑談十八世紀後期的訪碑活動〉，頁53-65。

㉝ 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368，乾隆五十七年條下。

㉞ 前引黃易稱賞錢泳模〈熹平石經〉的識語，後記有「嘉慶五年（1800）閏四月五日，梅溪過濟寧漢畫室，因記。錢塘黃易。」錢泳，《寫經樓金石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無頁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錢泳再過山東，謁曲阜孔廟，至同文門觀漢魏六朝唐宋諸碑。㉟ 隔年（1809）四月入京，有三個月左右的期間他的寓居之所與翁方綱家相近，兩人「朝夕往來談論金石圖書之學」，若因故不能時常相見則「以書札問答，至數十函之多。」㊱ 錢泳此時期眼界大開，尤其在山東地區所見、所獲之舊拓與新出石刻後來都成為〈攀雲閣帖〉中極重要的部份。

（三）「傳播與影響期」：由嘉慶中期（1810年左右）（52歲）起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以86高齡辭世

錢泳的隸書作品自中年起即廣受讚譽，同時號稱能混充漢隸，《履園叢話》與《寫經樓金石目》皆記有錢泳所書〈陳仲弓碑〉（又稱〈陳太邱碑〉）被書估充作漢碑，以應日本市場需求之事：

> 乾隆乙卯（1795）春日，吾友陳雪樵騎尉索書，刻石流播坊間。後數年書估竟將後跋截去，充作漢碑以售於人，故杭人有翻刻本。嘉慶廿年（1815）四月，忽有日本夷人認為原刻，索購五百冊，真可笑也。㊲

嘉慶中期以後，錢泳在隸書方面的影響愈趨擴大，首先是應阮元之請，為地方學校書立石經。自乾隆五十九年（1794）官定〈十三經〉（又稱〈乾隆石

㉟ 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379，嘉慶十三年條下。

㊱ 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380，嘉慶十四年條下。錢泳曾如此描述翁方綱在京師的住所：「所居京師前門外保安寺街，圖書文籍插架琳琅，登其堂者如入萬花谷中，令人心搖目眩而無暇談論者也。」錢泳，《履園叢話》，卷6，頁146。

㊲ 錢泳，《寫經樓金石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無頁碼。《履園叢話》中所記文字稍有不同：

> 「〈陳仲弓碑〉世亦無有，洪氏所載惟有〈太邱長陳寔壇碑〉。嘉慶元年（1796），余偶書一本贈山陰陳雪樵騎尉，騎尉遂以刻石，因椎搨數百紙傳播坊間，不知何時流入海外，日本人視為原刻，戊辰、己巳之間（1808－1809），寄信中華海舶，一時要五百本，市者仍以余書翻刻以應之。海外人以耳為目，不知真偽如此。」

見錢泳，《履園叢話》，卷9，頁236-2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經〉）刊刻完成，立於北京國子監後，各地方學校亦積極刊刻儒家石經，曾參與校勘〈乾隆石經〉的阮元（1764－1849）為其中最積極者，而錢泳又為阮元最為屬意的書手。㊳ 嘉慶十八年（1813），錢泳受阮元四百兩銀，以隸書完成抄寫官定版本《論語》、《大學》、《中庸》、《孝經》，共刻一百餘石置於揚州府學（後於道光元年（1821）移置蘇州郡學明倫堂後敬一亭）。㊴ 成於同治十年（1871）的《墨林今話》更記載錢泳晚年有挑戰書寫十三經的壯舉，惜事未成。㊵ 官定〈乾隆石經〉是以蔣衡（1672－1742）手書之楷書十三經為底本刻成，錢泳所書則為隸書，顯然是以東漢的〈熹平石經〉為模範依歸，在當時亦被認為「有東京蔡邕氏之遺風焉。」㊶

其次，錢泳晚年有大量的書法作品被刊刻成法帖流傳，其中隸書佔大部分。嘉慶二十一年（1816），施淦（字秋水，浙江紹興人）刻成《問經堂帖》，內收錢泳所臨漢隸十餘種；二十三年（1818），歷時十年之久的《攀雲閣帖》

㊳ 清高宗曾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頒諭內閣刊刻十三經，全部凡189碑，約63萬字，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完成，立於北京國子監。時在北京負責纂修《石渠寶笈續編》的阮元曾參與校勘〈乾隆石經〉，後來阮元積極於地方學校刻立石經，應與此經驗有關。參見何廣棪，〈《乾隆石經》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8年1月，頁7-17；王章濤，《阮元年譜》（合肥市：黃山書社，2003），頁40-41。

㊴ 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382，386，嘉慶十八年、道光元年條下。阮元與錢泳的書立石經計畫應開始於嘉慶初年，原本打算立於曲阜，同時人錢泰吉（1791－1863）有記：「梅溪嘗倣熹平石經寫《論語》、《孝經》、《大學》、《中庸》，章句文字謹遵聖祖仁皇帝、高宗純皇帝欽定本。初欲勒石於闕里，題曰『闕里石刻』，今在蘇州府學敬一亭兒，一百二十四石。」見錢泰吉，《曝書雜記》，卷1，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別下齋叢書本）。其他相關記載見阮元，〈石刻孝經論語記〉，《揅經室集》，一集，卷11，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清道光本）；王芑孫（1755－1817），〈闕里石刻禮記大學中庸之碑（代）〉，《淵雅堂全集（惕甫未定藁）》，卷10，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刻本）。

㊵ 蔣寶齡、蔣苣生，《墨林今話》：「（錢泳）工於八分，尤精隸古，晚歲以八分寫十三經，擬復鴻都舊觀。工力甚鉅，刻石未及半而止。」轉引自震鈞輯，《國朝書人輯略》，卷7，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三十四年刻本）。

㊶ 「今大學石經循用禮記舊文，而泳復以隸古書之，有東京蔡邕氏之遺風焉。謂宜列論語、孝經之後，樹之闕里，于以具先聖先師授受源流，于以彰示朝廷開牖後生……」王芑孫，〈闕里石刻禮記大學中庸之碑（代）〉，《淵雅堂全集（惕甫未定藁）》，卷10，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刻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完成；道光四年（1824），鮑崇城（字讓齋，安徽歙縣人，鹽商、刻書家，活動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以錢泳縮臨唐碑入石的32冊《縮本唐碑》完成，「京師諸公聞之莫不欲先睹為快，一時為之紙貴」；㊷ 八年（1828）正月生日時，仿效文徵明故事，以舊時臨模諸帖裝成卷冊，分贈親友；㊸ 同年自刻《學古齋四體書帖》，臨篆、隸、真、草書共70餘種，「以便初學觀覽」；此外還有《縮本漢碑》傳世。當錢泳辭世時，他的「金石碑版半天下」；㊹ 他的隸書在當時亦受到極高的讚譽，有人還認為是繼桂馥（1736－1805）之後第一者。㊺

綜觀錢泳一生對漢隸的學習與研究，由明人隸書始，後轉向直接學習漢魏碑版，建立書名，並研究古刻舊拓，在晚年則藉大量刻帖，宣揚自己對漢隸及其他金石書法的理解。錢泳學習漢隸的取徑與當時的金石學者，如翁方綱、桂馥、黃易、巴慰祖（1744－1793）等人接近。這一路習篆隸者強調文字或拓本的考證與研究，認為由此才能改正清初鄭簠等人挑踢過甚的毛病，趨近漢法。關於這點，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論隸書書學說得很明白：

> 國初有鄭谷口（簠）始學漢碑，再從朱竹垞（彝尊）輩討論之，而漢隸之學復興。然谷口學漢碑之剝蝕，而妄自挑趯；竹垞學漢碑之神韻，亦擅自增損，識者病之。惟長洲顧南原《隸辨》一作，能以諸碑參究，其法已開……。㊻

顧藹吉（字南原，活動於十七世紀末、十八世紀初）作《隸辨》，按韻編次隸字，並考證諸碑年代與存亡，是清代將碑版考證用於編纂字書的較早嘗

㊷ 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386-387，道光二年條下。

㊸ 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393，道光八年條下。

㊹ 錢泳的長孫錢慶榮：「先大夫平生著述等身，大半已出而問世，金石碑版半天下，身後之名當不慮其磨滅。」見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422。

㊺ 王芑孫（1755－1817）有懷桂馥詩：「未谷此行一萬里，此官一作安能止。六十曾非少壯時，未知死別復生離。天下八分誰第一，錢泳於今當繼出。到處漚波泛宅居，齋題畫舫見君謨。」王芑孫，《淵雅堂全集（編年詩藁）》，卷14，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刻本）。

㊻ 錢泳，《履園叢話》，卷11上「書學—隸書」，頁28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試。錢泳讚賞顧的作法，並認為惟有深究漢碑本末才能在隸法上有所突破，因古碑雖在，但用筆不傳，在沒有授受淵源、親承指畫的情形下「如花之初蕊，色香未備」，而透過追本溯源，「栽培既久，群艷爭芳，其勢然也。」㊼ 錢泳在同段文字中接著列舉善隸書家翁方綱、桂馥、錢大昕（1728－1804）、江德量（1752－1793）、伊秉綬（1754－1815）、巴慰祖、黃易及江鳳彝（活動於十八世紀末）等人，謂之「皆能以漢法自命者。」㊽ 這些人若非學者大儒，即精於金石考證與文字訓詁之學，書學實踐與學術研究並重，甚至認為前者需奠基於後者之上。

雖然錢泳認同這樣的取徑，㊾ 他與這群學者型書家仍有極大的差異。錢泳的書學相關活動帶有強烈的「工藝」性格或職業傾向，他不僅善「鐫碑、刻帖、雙鉤、響搨、臨模」諸事，還能為畢沅書刻蠅頭小八分於端硯，㊿ 都是需要高超的專門技巧才能勝任的工作。這種雙重特性亦顯示在錢泳對碑與帖的態度上，他對新興的漢隸傾力蒐羅與學習，最後卻仍是以舊有的帖的方法，來為之建立理解與推廣的架構，其過程其實亦反應了十九世紀初期帖、碑學書法風尚交會的時代背景。以下以《攀雲閣帖》為例來探討錢泳如何具體展開這項工作。

二、《攀雲閣帖》的刊刻與內容

早在乾隆五十四至五十五年（1789－1790）間，當錢泳遊畢沅幕中時，即有《攀雲閣帖初刻》兩卷的刊行，內收有錢泳臨11種漢碑：(51)

㊼ 錢泳，《履園叢話》，卷11上「書學—隸書」，頁286。

㊽ 錢泳，《履園叢話》，卷11上「書學—隸書」，頁286。

㊾ 活動於同時期的篆隸書家鄧石如（1743－1805）為另一種典型，出生寒士，讀書不多，在當時不為以翁方綱為代表的學者型書家所歡迎。鄧約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為畢沅延攬入幕，三年後辭歸，與錢泳在幕中時間非常相近，然錢泳僅在《履園叢話》中提到鄧石如善小篆，其他眾多著作與年譜中皆未再談及。錢泳，《履園叢話》，卷11上「書學—小篆」，頁285。

㊿ 錢泳的館師陸紹曾號稱是蠅頭八分的鼻祖，錢泳的這項技藝可能即學自陸，參見注11。

(51) 錢泳，《寫經樓金石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卷：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碑（漢安二年（143））
　　司隸校尉楊君石門頌（建和二年（148））
　　魯相乙瑛請置百石卒史碑（永興元年（153））
　　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永壽二年（156））
　　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164））
下卷：執金吾丞武榮碑（永康元年（167））
　　博陵太守孔彪碑（建甯四年（171））
　　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峻碑（熹平二年（173））
　　豫州從事尹宙碑（熹平六年（177））
　　白石神君碑（光和六年（183））
　　蕩陰令張遷表頌（中平三年（186））

嘉慶十三年（1808）錢泳又刻《攀雲閣帖》，直至二十三年（1818）才完成，帖中收錢泳臨東漢至三國魏隸書碑，數量擴增至54種，堪稱畢生習漢隸之大成。

（一）版本

就筆者目前所知，《攀雲閣帖》有兩種版本：一為上海求古齋書帖局於二十世紀初影印出版之八卷本（以下稱「八卷本」）；二為今天較常見之四集十六冊本（「冊」與「卷」可相互替換，[52] 以下稱「十六卷本」）。筆者推測「八卷本」是《攀雲閣帖》全帖初完成時的樣貌，「十六卷本」則是錢氏家族後來的重刻本，據附刻題跋年代可知，晚至道光（1821－1850）中期仍持續刊行。

1.「八卷本」

筆者未曾見「八卷本」的原帖，僅能就上海求古齋影印出版的本子來討論。無錫人周鍾麟（齋號求古齋、碧梧山莊，活動於二十世紀初）二十世紀初葉在上海經營求古齋碑帖局，約當1920年代出版《攀雲閣帖》時將之改名為《漢碑大觀》，共有八集，汪仁壽（字爾康，號靜山，江蘇無錫人，1875－

[52] 帖後曹奕麟跋即稱此本為十六「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36）為各集封面題署（圖7）並書目錄。第一集內頁附錢泳像（圖8）與小傳（圖9）；第八集末的版權頁載明發行者與定價（圖10）。由於經過改名與重裝，原本的裝幀形式已不得見，然卷次、內容行列安排與帖後題跋應仍保留了原樣。《漢碑大觀》的「八集」即對應到原《攀雲閣帖》的「八卷」。

帖中所收為錢泳臨東漢至三國魏篆書與隸書碑，基本上按原碑的年代先後排序，最早的是元初四年（117）的〈三公山碑〉（帖中唯一的篆書碑），最晚的為青龍三年（235）的〈魏廬江大（太）守范式碑〉，共54種。各段臨書後，有小字隸書寫明碑名，如「右三公山碑」（圖11）、「魯相乙瑛請置百石卒吏碑」等。有時並附刻有錢泳印記，包括「錢泳私印」、「吳越世家」、「金匱錢氏圖書」、「錢泳之印」、「吳越王孫」等。

帖末有錢泳、潘奕雋（1740－1830）、江鳳彝（活動於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圖12-14）及錢泳二子曰奇與曰祥跋（圖15-16）。錢泳在跋中自述刊刻《攀雲閣帖》的目的，為提供初學者觀覽之用（圖12）：

> 嘉慶十有三年（1808）春，節臨漢魏諸碑計五十餘種，俾曰奇、曰祥兩兒刻之家塾，為初學觀覽。勾吳錢泳記。

錢曰奇與曰祥長跋則交代了《攀雲閣帖》的刊刻過程。

錢曰奇跋（圖15）：

> 家君總角時即工隸古書，乾隆己酉、庚戌（1789－1790）間常臨漢碑數種，為劉君湘南、楊君補颿所刻。既為陳雪樵總戎書陳仲弓碑，又為趙晉齋文學書郭有道碑，俱經刻石，海內流傳將三十年矣。書估每以搨本裁去年月、名氏，充作古刻，可咲也。嘉慶戊辰（1808）春，曰奇取家君平時所臨漢魏諸碑，凡得五十餘種，陸續鉤摹，或作或輟，至戊寅（1818）仲秋，始得竣事。視前刻有十倍之富，而漢人各體無美不收，真可謂集大成者矣。蓋漢魏距今幾二千年，諸碑日漸日少，得此刻者，尚知所寶貴哉。男曰奇謹識。

錢曰祥跋（圖16）：

> 右攀雲閣臨漢碑八卷，家嚴中年自課以示祥兄弟間為模範者也。大兄偉堂手自摹刻，十年迺成，自今以後學古隸者，可不必求之古碑而能自得師矣。祥嘗論隸書之道莫備於漢魏，至兩晉六朝稍衰，而唐時又盛，自唐以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 後竟成絕學。國朝右文稽古，斯道復興，雖一藝之長，亦有氣數存乎其間也。惟家嚴少工文翰，留心書學，以為真行草書必宗篆隸，尋源追本，旨哉是言。世之留心於斯道者，先知其所宗法，則思過半矣。男曰祥謹識。

由錢氏父子三跋可得知，《攀雲閣帖》意圖於「漢人各體，無美不收」，以為初學者臨書典範，使「自今以後學古隸者，可不必求之古碑而能自得師矣。」漢魏碑刻篆隸雖然自清初以來備受推崇，然學書者欲臨仿時卻常遭遇許多不便。一般學生難得佳拓，若有幸得見，還有實際學習上的技術問題需克服：古碑的整拓通常尺寸極大，難以置於案頭臨寫；剪裱本展閱方便，然若字跡殘損，可能數頁才得一、二個完整的字。此外古碑年代久遠，字跡經常磨滅不清，益增學習的困難。錢泳收集眾碑，將豐碑巨著縮小於方寸間，並以清晰明白的筆法、統一的格式呈現，其方便學習的意圖非常明顯。

錢曰奇與曰祥跋皆無紀年，據語氣判斷應是初刻成時即作，又由曰祥跋稱「右攀雲閣臨漢碑八卷」來看，此帖原是以八卷本刊行。現今較常見的版本則是「十六卷本」，雖然主要內容與「八卷本」一致，但修正了原先編排上的部份錯誤，分卷及版面安排經過重新設計，帖後題跋並有增加，是錢氏家族後來的重刻本。

2.「十六卷本」

上海圖書館藏有一套「十六卷本」，裝裱散落，發霉蛀蝕，但內容仍稱完整，以下據此討論此本特點。

此本分為初集、二集、三集及四集，每集四冊，共十六冊。每冊約高28.5公分，寬15公分。每集前有木刻目錄，除記該集所收碑目與數量，並記模勒年月及「錢氏寫經堂」堂號，鈐有「攀雲」篆書朱文長方印、「常熟□門外□家莊梅花溪上錢寫□堂藏板」楷書朱文長方印與「寫經堂印」篆書朱文方印（圖17）。每冊起首處有「攀雲閣臨漢碑」篆書八字兩行標題（圖18）。與「八卷本」一樣，每段臨書末有小字隸書碑名，並附刻錢泳印記，只是印記位置稍有不同。而「八卷本」與「十六卷本」最大的不同在卷次安排，兩本的碑目與卷次如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八卷本」	「十六卷本」		
	漢碑名稱	漢碑年代	卷次	集、冊		木刻目錄所記模勒年月與堂號
1	三公山碑	元初四年（117）	一	初集	第一冊	「右漢碑十七種。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1808）九月，金匱錢氏寫經堂模勒上石。」
2	嵩山太室神道石闕	元初五年（118）				
3	平原濕陰邵善君題名	永建四年（129）				
4	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碑	漢安二年（143）				
5	武氏石闕題字	建和元年（147）				
6	司隸校尉楊君石門頌	建和二年（148）				
7	魯相乙瑛請置守廟百石卒史碑	永興元年（153）			第二冊	
8	宛令益州刺史李孟初碑	永興二年（154）				
9	孔謙碑	永興二年（154）				
10	曲阜孔君殘碑	永壽元年（155）				
11	集孔宏碑字	無年月				
12-1	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I）	永壽二年（156）	二			
12-2	魯相韓敕造孔廟禮器碑（II）	永壽二年（156）			第三冊	
13	執金吾丞武榮碑	永康元年（167）				
14	郎中鄭固碑	延熹元年（158）				
15	蒼頡廟碑	延熹五年（162）				
16-1	泰山都尉孔宙碑（I）	延熹七年（164）				
16-2	泰山都尉孔宙碑（II）	延熹七年（164）			第四冊	
17	西嶽華山廟碑	延熹八年（1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	魯相史晨饗孔廟後碑	建甯二年（169）	五	二集	第一冊	「右漢碑十一種。嘉慶十五年歲在庚午（1810）五月，金匱錢氏寫經堂模勒上石。」
19	竹邑侯相張壽碑	建甯元年（168）				
20	衛尉卿衡方碑	建甯元年（168）				
21	魯相史晨奏祀孔子廟碑	建甯二年（169）			第二冊	
22	北海淳于長夏承碑	建甯三年（170）				
23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建甯四年（171）	六		第三冊	
24	博陵大守孔彪碑	建甯四年（171）				
25	析里橋郙閣頌	建甯五年（172）				
26	成陽靈臺碑	建甯五年（172）			第四冊	
27	司隸校尉楊淮碑	熹平二年（173）				
28	司隸校尉忠惠父魯峻碑	熹平二年（173）				
29	曲阜東闕殘碑	熹平二年（173）	三	三集	第一冊	「右漢碑十三種。嘉慶十九年歲在甲戌（1814）三月 ，金匱錢氏寫經堂模勒上石。」
30	豫州從事孔褒碑	無年月				
31	武都太守耿勳碑	熹平三年（174）				
32	玄儒先生婁壽碑	熹平三年（174）				
33	聞熹長韓仁銘	熹平四年（175）			第二冊	
34	堂谿典嵩高石闕銘	熹平四年（175）				
35	豫州從事尹宙碑	熹平六年（177）				
36	溧陽長潘乾校官碑	光和四年（1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7	涼州刺史魏元丕碑	光和四年（181）	四	三集	第三冊	
38	白君神石碑	光和六年（183）				
39	郃陽令曹全碑	中平二年（185）				
40	幽州刺史朱龜（伯靈）碑	中平二年（185）			第四冊	
41	蕩陰令張遷表頌	中平三年（186）				
42	小黃門譙敏碑	中平四年（187）	七[53]	四集	第一冊	「右漢碑十種。嘉慶廿三年（1818）歲在戊寅三月，金匱錢氏寫經堂模勒上石。」
43	圉令趙君碑	初平元年（190）				
44	巴郡太守樊敏碑	建安十年（205）			第二冊	
45	本周末嗣戚氏龍以興勃海君玄孫伯著碑（戚伯著碑）	無年月				
46｜49	西門豹祠殘碑（計五段）					
	（1）子游殘碑	元初二年（115）				
	（2）劉君殘碑（I）、（II）	光和四年（181）				
	（3）元孫殘碑	無年月				
	（4）正直殘碑	無年月				
50	酸棗令劉熊碑	無年月	八		第三冊	
51	魏黃初元年封孔羨碑	黃初元年（220）				
52	魏公卿上尊號奏	延康元年（220）				
53	魏受禪表	黃初元年（220）			第四冊	
54	魏廬江太守范式碑	青龍三年（235）				

[53]「八卷本」第七卷的各碑順序與「十六卷本」稍有不同。「八卷本」順序為〈小黃門譙敏碑〉、〈圉令趙君碑〉、〈戚伯著碑〉、〈西門豹祠殘碑〉、〈巴郡太守樊敏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上表可見，「八卷本」第五與六卷的漢碑年代早於第三與四卷，若將兩組順序對調，則成正確序列，這個錯誤在「十六卷本」中已經改正。而由於改刻成十六卷，錢曰祥跋中所稱「右攀雲閣帖八卷」已不適用，或許因此此跋並未收入「十六卷本」中。二本的題跋還有多處不同，茲列表如下：

「八卷本」（據《漢碑大觀》）題跋			「十六卷本」（據上圖藏本）題跋		
1	錢泳跋（楷書） 嘉慶十三年（1808）春	7行 行4-6字	1	錢泳跋（楷書） 嘉慶十三年（1808）春	6行 行4-7字
			2	翁方綱觀款（行書） 嘉慶十四年（1809）冬十月朔	2行 行7-8字
			3	姚元之觀款（行草書） 嘉慶十四年（1809）孟秋九日	2行 行7-8字
2	潘奕雋觀款（行書） 嘉慶十七年（1812）二月十二日	3行 行8-9字	4	潘奕雋觀款（行書） 嘉慶十七年（1812）二月十二日	3行 行8-9字
3	江鳳彝跋（行書） 嘉慶廿四年（1819）初秋	6行 行2-12字	5	江鳳彝跋（行書） 嘉慶廿四年（1819）初秋	4行 行8-14字
4	錢曰奇跋（隸書） 無紀年	10行 行15-19字			
5	錢曰祥跋（楷書） 無紀年	9行 行11-22字			
			6	張鏐等13人觀款，鮑崇城題（楷書） 嘉慶廿三年（1818）夏五月	4行 行6-15字
			7	浦洽文觀款（隸書） 道光十八年（1838）正月	3行 行9-13字
			8	胡源跋（行書） 無紀年	4行 行8-16字
			9	方成等7人觀款（楷書） 無紀年	3行 行8-12字
			10	曹奕麟跋（楷書） 無紀年（約1820年）	3行 行16-23字
			11	華士儀觀款（楷書） 道光五年（1825）秋七月	2行 行6-12字
			12	周芳容觀款（隸書） 道光八年（1828）二月朔日	2行 行7-8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表顯示，「十六卷本」無錢曰奇與曰祥跋，但多了翁方綱、姚元之及嘉慶至道光年間張鑛等多位錢泳弟子的跋與觀款（圖20-22）。[54] 在兩種版本皆有的題跋中，行列排式有時卻大不相同，例如錢泳跋（圖12、19）與江鳳彝跋（圖23）都經改動。同樣的情形亦屢見於各卷，例如〈三公山碑〉、〈乙瑛碑〉、〈西嶽華山廟碑〉等臨書段落末尾的小字碑名與錢泳印記在兩本中都不一致，而〈孔宙碑〉更是在「十六卷本」中被分成兩段，「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以下被歸入另一冊中（圖24-1、24-2）。這些現象顯示「八卷本」與「十六卷本」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刻版。「十六卷本」的始刻時間難以斷定，而附刻的題跋年代最晚者為道光十八年（1838），顯示晚至此時仍持續刊行。

（二）選件

《攀雲閣帖》所收漢魏碑刻，不論數量或種類都顯現了錢泳極力求全的野心。首先在數量方面，乾隆晚期至嘉慶初年間得見的主要漢魏石刻（包括原石已佚，僅存拓片或鉤摹本者）約在80至100種之譜，[55]《攀雲閣帖》收五十四種，已過其半。其次在種類方面，除一網打盡煊赫名碑，並涵蓋許多較為罕見的品項，包括十八世紀以後的新出石刻，以及私人藏家手中的舊拓與鉤摹本。其中有考古訪碑所得之新材料，亦有傳稱為漢代但實為後人重刻或擬刻之碑，性質迥異，以下就其來源分別說明。

---

[54] 容庚《叢帖目》中所記之本雖亦為四集十六冊本，但題跋與藏於上海圖書館者不同，可能為另一版本。容庚，《叢帖目》，第4冊，頁1743-1747。

[55] 王昶的《金石萃編》成書於嘉慶十年（1805），收羅廣泛、體例完備，可看作是此一時期整理與考證金石材料的較完整呈現，書中所收漢至三國時期的石刻（不含塼瓦文）即有80餘種。《金石萃編》未收錄，而在乾隆與嘉慶初年較為重要的舊拓、鉤摹本，及後代擬刻及重刻之碑，如黃易收藏的〈小黃門譙敏碑〉、〈魏元丕碑〉、〈朱龜碑〉與〈成陽靈臺碑〉等，還有約十餘種。黃易的《小蓬萊閣金石目》（作於1802年以前）所列漢及三國石刻超過150種（不含塼瓦文），但其中有許多是極小塊的殘石，又時將碑陽、碑陰及碑側分別著錄，因此數字僅能供參考。王昶，《金石萃編》，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嘉慶十年刻同治錢寶傳等補修本）。黃易，《小蓬萊閣金石目》，上海圖書館藏抄本。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1.新出石刻

錢泳與金石學家往來密切，對當時的訪碑活動與成果有極佳的掌握，《攀雲閣帖》的最重要特色之一，即是收入十八世紀以後新發現或出土的石刻。在全帖54種漢碑中，新出石刻即有14種，[56] 超過1/4。下表依序列出這些石刻，並附發現或出土過程，以及相關著錄與原碑拓片圖版出處：

	碑名	碑年代	發現或出土過程	《金石萃編》著錄與圖版揭戴
1	祀三公山碑	元初四年（117）	乾隆三十九年（1774），河北元氏縣令王治岐於縣城外發現；四十年（1775），黃易客居南宮（今河北省南宮市），請託友人取拓，並屬縣令移置龍化寺。	《金石萃編》卷6；《漢碑集成》[57] 圖版49，頁316
2	平原濕陰邵善君題名（肥城孝堂山石室畫像石刻第六石題記）	永建四年（129）	黃易1770年代至1790年代在濟寧時曾取拓，並新得殘字。共有十石，此段題名位於第六石的左下。	《金石萃編》卷7；《漢碑集成》圖版63，頁319
3	武氏石闕題字	建和元年（147）	乾隆五十一年（1786），黃易於山東嘉祥紫雲山下訪得。	《金石萃編》卷8；《漢碑集成》圖版76，頁321
4	宛令益州刺史李孟初碑	永興二年（154）	乾隆間，河南南陽府白河水漲時衝出。	《金石萃編》卷8；《漢碑集成》圖版85，頁323
5	曲阜孔君殘碑	永壽元年（155）	乾隆五十八年（1793）暮春，何元錫於曲阜孔林牆外訪得，移置孔廟。	《金石萃編》卷8；《漢碑集成》圖版89，頁324

[56]〈魏盧江太守范式碑〉的篆額碑首及碑身殘石，分別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月及五十四年（1789）暮春出土於濟寧州學附近，為十八世紀重要的發現之一。然錢泳在《攀雲閣帖》中所臨此碑實據黃易所藏之「宋拓本」，與新出殘石無關，因此不將其計入。

[57] 金石拓本研究會編，《漢碑集成》（京都市：同朋舍，199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	集孔宏碑（又稱「魯相謁孔廟殘碑」）字	無年月	原倒於曲阜孔子廟同文門內，乾隆四十四年（1779）冬，何元錫洗滌曲阜孔廟諸碑，始為剔出重拓	《金石萃編》卷19；《漢碑集成》圖版169，頁340
7	郎中鄭固碑	延熹元年（158）	雍正六年（1728）濟寧人李鱟於濟寧州學泮池左發現最下截殘石。乾隆四十三年（1778）六月，李鱟之子李東琪與定海藍嘉瑄再將碑身從地面升起，發現有高約一尺的部份被掩埋在地下。	《金石萃編》卷10；《漢碑集成》圖版95，頁325-326
8	竹邑侯相張壽碑	建甯元年（168）	乾隆五十六年（1791），知縣林紹龍建亭重嵌於山東武城孔廟。	《金石萃編》卷12；《漢碑集成》圖版107，頁328
9	曲阜東闕殘碑（又稱「熹平殘碑」）	熹平二年（173）	乾隆五十八年（1793），黃易五十壽辰，遣工拓碑，在曲阜東門外得熹平二年殘碑。	《金石萃編》，卷15；《漢碑集成》圖版130，頁332
10	豫州從事孔褒碑	無年月	雍正三年（1725），出土於山東曲阜東之周公廟附近。	《金石萃編》，卷14；《漢碑集成》圖版124，頁331
11｜14	西門豹祠殘碑之（1）子游殘碑	元初二年（115）	嘉慶三年（1798），徐方於安陽豐樂鎮西門豹祠中發現殘石，移置孔廟戟門下。	《金石萃編》卷19；《漢碑集成》圖版47、143、171、 172，頁315-316、335、 341
	西門豹祠殘碑之（2）劉君殘碑	光和四年（181）		
	西門豹祠殘碑之（3）元孫殘碑	無年月		
	西門豹祠殘碑之（4）正直殘碑	無年月		

這14種新出石刻分佈於山東、河南與河北，以山東最多，正是十八世紀訪碑最盛的地區。發現最晚的是河南安陽西門豹祠內的4種殘碑（發現於1798年），僅早於《攀雲閣帖》的始刻（1808）10年。由表中所列可看出，黃易及其在山東地區的友人何元錫（字夢華，浙江杭州人，1766－1829）、李東琪（字鐵橋，山東濟寧人，活動於十八世紀中晚期）的影響極為清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由於這些新出石刻多為殘碑，錢泳在《攀雲閣帖》中採集字方式，將尚能辨認的字連綴成能讀通的句子，如〈曲阜孔君殘碑〉擷取碑中段15字，組合成「履方朝廷，德施州里。守長史，兼行相事」（圖25-1、25-2）；〈孔宏碑〉取中段16字，重組成「昔在周人，典謨章德，因而銘之，民以獲福」（圖26-1、26-2）；〈曲阜東關殘碑〉僅臨殘碑之第一、三、四行（圖27-1、27-2）；而〈西門豹祠殘碑〉中的〈元孫碑〉集字僅得7字（圖28-1、28-2），在全帖中字數最少。集殘碑字另成文章，已非原碑面貌，實是碑學講求書法學習下的產物，而迥異於金石學考證，下文就此點有較詳細的討論。

2.黃易家藏舊拓

除了新出石刻，黃易家藏的6種罕見舊拓亦成為《攀雲閣帖》收羅的對象：

	碑 名	碑 年 代	黃易入藏經過
1	成陽靈臺碑	建甯五年（172）	乾隆五十年（1785）五月，黃易得張玉樹（蔭堂、芑堂）贈舊搨褾冊本
2	涼州刺史魏元丕碑	光和四年（181）	乾隆四十八年（1783）夏，黃易得王古愚贈泰安趙氏藏剪裱本，為惟一傳世拓本
3	幽州刺史朱龜碑	中平二年（185）	同1
4	小黃門譙敏碑	中平四年（187）	同1
5	圉令趙君碑	初平元年（190）	黃易原有剪褾本，又於嘉慶元年（1796）得張玉樹贈整拓本
6	魏盧江太守范式碑	青龍三年（235）	同2

表中編號第1-4及6等五種舊拓剪裱本先後於1783與1785年入藏黃易之手，由於它們裝潢一致，黃易認為原屬同一藏家所收，後世學者亦經常將它們合稱。[58] 此五種中除〈范式碑〉外，皆被翁方綱訂為後代重刻本，[59] 然重刻年代可

[58] 上海有正書局曾在1926年將這五種拓本以「黃小松藏漢碑五種」之名一起出版，見有正書局輯，《黃小松藏漢碑五種》，第1-5冊。2009年11月北京故宮舉辦之「蓬萊宿約：北京故宮藏黃易小蓬萊閣漢魏碑刻特展」中亦將它們陳列在一起，稱為「漢魏五碑」，並參見此展覽之圖錄：故宮博物院編，《蓬萊宿約：故宮藏黃易漢魏碑刻特集》。

[59]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卷16，下冊（臺北市：台聯國風出版社，1976），頁901-9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能早至宋代，又不見其他版本流傳，黃易因此格外珍視，曾製作雙鉤摹本，刊印於《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中。[60] 錢泳曾在1792年六月訪黃易時獲觀且留下題字與印記（詳前一節），對這些拓本並不陌生。編號第5〈圉令趙君碑〉在十八世紀晚期有數種拓本流傳，包括錢大昕所收一本整拓本，及黃易的一本整拓與一本剪裱本。據《履園叢話》記載，錢泳於兩種整拓本都曾寓目，[61] 黃易的剪裱本有雙鉤摹本刊印於《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中，錢泳亦熟悉。

在《攀雲閣帖》中，錢泳放大字體（如〈成陽靈臺碑〉字徑原僅有寸許（約3.33公分），錢泳臨書字徑將近4.5公分），將斑駁泐蝕的字跡臨寫成清晰流暢的字形，並進一步強調、甚至添加八分隸書左右開張的撇捺與波磔，使得原本偏於方折的用筆趨向圓轉（圖29-1、29-2）。值得注意的是，錢泳臨黃易所藏這幾種舊拓，都與《小蓬萊閣金石文字》（圖29-3）中的雙鉤字形尺寸接近，每行六字的安排亦相仿，或即節臨自此。

3.其他私人藏舊拓

錢泳在《攀雲閣帖》中所臨漢碑，還有來自其他私人藏舊拓，茲舉數例如下。

（1）〈西嶽華山廟碑〉

〈西嶽華山廟碑〉原在陝西華陰縣西嶽廟中，毀於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地震，片石無存。此碑是清代碑學家最為注重的漢碑之一，石雖不存，在清代有「長垣本」、「華陰本」、「四明本」及「順德本」四種舊拓流傳。[62] 除此

[60] 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76）。

[61] 錢泳，《履園叢話》：「往時見海鹽張芑堂徵君案頭有此碑，是全張未裝者，既復見家汀州先生家亦有全碑一張。……數年內凡兩見，似此碑猶在人間，或隱於荒山窮谷間，難以尋覓耳。」據此，錢泳見張芑堂本整拓在入黃易手之前。錢泳，《履園叢話》，上冊，卷9，頁238。

[62] 關於這四種拓本的年代與流傳，參見林業強的考訂。林業強編著，《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外，乾嘉年間還有許多從這些舊拓衍生而來的鉤摹本與再摹本。[63] 錢泳對各種版本的討論十分關心，亦曾寓目聲名顯赫的舊拓，[64] 但他在《攀雲閣帖》中的臨書並不囿於原碑的字形細節，實難斷定所據為何本，最可能是綜合各種版本，以自己對此碑隸書的理解重新臨寫而成的。

（2）〈夏承碑〉（吳門陸恭藏）

碑原在河北永年柴山書院，嘉靖二十二年（1543）毀，後重刻立石。此碑重刻本甚多，結字寬闊、多圓轉用筆，並有楷書筆意夾雜其中，去古已遠，然自明以來一直受到書家喜愛。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記曾見吳門陸恭（字謹庭，1741－1818）家中一本舊拓：

> 吳門陸謹庭孝廉家有夏承碑，中闕『化行』以下三十字，後有豐人叔（坊，1492－1563？）、楊景西（繩祖，活動於十七世紀）二跋，即吳山夫（玉搢，1698－1773）雙勾之所出也。王虛舟（澍，1668－1743）所見亦即此本。明嘉靖間，是碑與婁壽碑俱吾鄉華東沙氏（夏，活動於十六世紀前半）故物，今重刻本甚多，不堪入目矣。[65]

陸恭是清中期蘇州畫家，家中多藏古帖名畫。[66] 錢泳並非以考證見長（此

---

[63] 錢泳熟識的金石學家畢沅與翁方綱即曾擁有，甚至製作〈華山廟碑〉的鉤摹本。參見施安昌，《漢華山碑題跋年表》（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64] 《問經堂帖》（1813－1816）錢泳臨此碑後跋：「西嶽華山廟碑世無善本，近所見者惟商邱陳氏、揚州阮氏兩本而已。」所謂商邱陳氏本即是「長垣本」，而揚州阮氏即是「四明本」。今「四明本」上並有錢泳嘉慶十九年（1814）觀款，見施安昌，《漢華山碑題跋年表》。錢泳關於各本舊拓的討論見《履園叢話》，上冊，卷9，頁234。

[65] 見錢泳，《履園叢話》，上冊，卷9，頁237。

[66] 陸恭生平見潘奕雋，〈例授文林郎庚子科舉人揀選知縣陸君墓誌銘〉，《三松堂集》，卷四，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刻本）。陸恭家最著名的收藏為《宋拓王右軍帖》（淳化閣帖泉州本殘本）（現藏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唐昭仁寺碑》拓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及元趙孟頫《鮮于府君墓誌銘》拓本（現藏上海圖書館）等。《履園叢話》卷十「收藏」還記有陸恭其他家藏，包括宋代《朱文公註經草稿真蹟》、文信國書《慈幼堂》三字，及元代趙孟頫《李太白廬山觀瀑圖》等書畫。錢泳，《履園叢話》，上冊，卷10「收藏」，頁273、274、2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處考證陸恭藏本來源的說法全按翁方綱《兩漢金石記》[67]），但顯然熟悉蘇州當地藏家手中的善拓，《攀雲閣帖》中所臨〈夏承碑〉應即據此陸恭家藏拓本而來。

（3）〈婁壽碑〉（吳門蔣韻濤藏）

碑原在湖北襄陽光化縣，經歐陽修、趙明誠、洪适等人著錄，但明時已亡佚，惟華夏真賞齋收藏有一剪裱本，前闕48字，後並有豐道生（坊）題跋。此拓本在乾隆年間傳入蘇州蔣韻濤（生平不詳，活動於十八世紀）之手，乾隆六十年（1795）錢泳從蔣春皋（韻濤姪）處雙鉤得之，並寄予翁方綱。[68] 今上海圖書館藏有此雙鉤的鋟印本，可得見此帖與諸跋樣貌（圖30）。《攀雲閣帖》中的錢泳臨書即據此而來，然更強調拉長的撇捺，字形大小則變得較為一致（圖31）。

（4）〈樊敏碑〉（友人王晉康藏）

碑原在四川雅州蘆山，傳乾、嘉年間尚在，《履園叢話》記錢泳曾臨友人王晉康（生平不詳，活動於十八世紀晚期）藏拓本：

> 乾隆四十九年（1784），余寓吳門春暉堂陸氏（即陸紹曾），友人王晉康示余《樊敏碑》，視其搨本，的是原刻，為臨一過而還之，以為坊間尚有也。後數年欲購不得，當面錯過，至今猶悔。[69]

（5）〈劉熊碑〉

原碑早佚，1915年顧燮光在河南尋得一塊殘石，今在河南延津文化館。[70] 乾隆年間有數種拓本與雙鉤本流傳，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記曾見4本：

---

[67]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上冊，卷10，頁550-580。

[68] 見錢泳，《履園叢話》，上冊，卷9，頁234。

[69] 見錢泳，《履園叢話》，上冊，卷9，頁238。

[70] 參見顧燮光，《漢劉熊碑考》，收入《石刻史料新編》 第三輯 （臺北市：新文豐，1986），第35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曩時見歙縣巴隽堂氏（慰祖，1744－1793）有雙鈎本，既又見揚州汪容甫（中，江蘇江都人，1745－1794）家有宋搨原本，雖經殘蝕，其字較多於巴氏，且有出于洪釋之外者。後江秋史（德量，1752－1793）又為雙鈎，以巴、汪兩家合參之，然總缺上半截。後見明州天一閣舊搨本，有「君諱熊字孟陽」下缺十字，始接「大帝垂精接感篤生聖明」等字，則知江秋史所鈎是下半截也。⑦①

《攀雲閣帖》中所臨自「垂精接感，篤生聖明」等字始，共76字，皆從此碑下半截出。

（6）〈戚伯著碑〉

此碑原在安徽宿州，經歐陽修、趙明誠、洪适著錄，石久佚，拓片流傳亦少。清初朱彝尊稱曾見孫承澤藏宋拓本，⑦② 讚賞其字與〈夏承碑〉同為漢隸「奇古」一路。⑦③ 後來的金石著錄鮮有提及，僅嚴可均（1762－1843）的《鐵橋漫稿》記此宋拓本於嘉慶丙寅年（1806）歸孫星衍之仲弟星衡，「……碑石久佚，今世收藏家無著于錄者，恐海內未必有第二本，因盡日之力，手自雙鈎，以待好古者重刻以廣其傳。」⑦④ 錢泳在《攀雲閣帖》中的臨書結字方整、字間上下特別緊密（圖32），風格與帖中其他漢碑有相當差距，應有所本而來，可能即此宋拓或其鈎摹本。

整體而言，錢泳對漢碑的蒐羅十分廣泛，對乾、嘉年間金石學者們關心的種種拓片與著錄的考證問題亦非常留心。《攀雲閣帖》不僅有新出的石刻殘

---

⑦① 見錢泳，《履園叢話》，上冊，卷9，頁238-239。

⑦② 朱彝尊，〈漢戚伯著碑跋〉，《曝書亭集》，卷47，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影印康熙本）。

⑦③ 「漢隸凡三種，一種方整，鴻都石經、尹宙、魯峻、武榮、鄭固、衡方、劉熊、白石神君諸碑是已；一種流麗，韓勅、曹全、史晨、乙瑛、張表、張遷、孔彪、孔宙諸碑是已；一種奇古，夏承、戚伯著諸碑是已。惟延熹華山碑，正變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長，當為漢隸第一品。」朱彝尊，〈跋華山碑〉，《曝書亭集》，卷47，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影印康熙本）。

⑦④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9，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道光十八年刻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碑，還有傳世的罕見舊拓，其成果不僅來自與北方的金石學者，如黃易、翁方綱等人的密切交流，亦網羅了江南地區藏家手中的珍品，可視為錢泳對十八世紀考碑成果的匯整及呈現。

（三）編集原則與臨書風格

錢泳的臨書有長有短。他有時擷取長篇碑文（如〈乙瑛碑〉、〈禮器碑〉、〈西嶽華山廟碑〉、〈史晨前碑〉、〈張遷碑〉等），甚至全碑照書（如〈史晨後碑〉），這樣的情形動輒超過百字，最長的是節臨〈張遷碑〉，有365字。若原碑殘損嚴重，錢泳則採集字方式，將尚能辨認的餘字連綴成能讀通的句子，這種臨書字數較少，例如前述新出殘碑的臨書大多僅有十餘字，字數最少的是〈西門豹祠殘碑〉五段中的〈元孫碑〉集字，僅有7字。

錢泳選取節臨段落時首重文意，多取國富民豐或勤學利民、品德高尚的良吏事蹟等正面意義的段落：例如節臨〈祀三公山碑〉之「神熹其位，甘雨履降，國界大豐，穀斗三錢」16字出自原碑第六至七行，著眼於降雨有利於作物生長的文字內容；在〈嵩山太室神道石闕銘〉中，選取「春生萬物」起至「刻石紀文」止共48字，此段描述四海蒙神恩、獲降慈雨。錢泳無意於以碑證史的探究，他的目的僅在選取內容妥當、適合臨寫的書法教材。漢碑多墓石，碑文記述墓主家族世系、生平歷官及品行事蹟，前二者的記載如流水帳，錢泳大多不選，而僅取描述品行事蹟的段落，例如〈北海相景君碑〉僅取原碑第二行末至第七行首，描述景君德行的文字，不取起首處的年月及後面所列漢帝授予之官位，中間並捨去「乃作誄曰」一句，使這段文字脫離原本的碑文脈絡。這種情況亦見於非表頌個人的碑銘上，例如〈乙瑛碑〉的內容是魯相乙瑛上陳朝廷，請置守孔廟官員的奏文，金石學者將其視為研究東漢公文書的重要材料，然這顯然並非錢泳的關心重點，他的臨書略去起首照錄東漢公文的部份，並改動用語：奏文末原為「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稽首以聞」，錢泳臨書改為「頓首頓首以聞」，似乎有意避開「死罪」一詞。如此一來，擷取的段落完全無益於碑文考證，卻是文意妥當、適於臨寫的極佳學書教材。

在臨寫風格上，錢泳努力趨近原碑，留心尺寸與書風，欲呈現漢隸的多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樣貌，如秀氣流麗的〈曹全碑〉（圖33）、嚴謹方正的〈禮器碑〉、雄強的摩崖刻石〈石門頌〉（圖34）與裝飾筆法較多的〈范式碑〉（圖35）等都在他的筆下一一展現。然錢泳似乎對〈曹全碑〉一路提按豐富、筆畫流暢的風格，以及裝飾意味濃厚、字形均整的曹魏時期作品最為拿手，也最能貼近原碑的味道。他在臨寫其他漢碑時，都難脫用筆圓轉流暢的習慣，以致不易掌握漢碑古樸而又變化出奇的風格，例如錢泳臨〈祀三公山碑〉大致掌握了原碑字形，但用筆弧線增加，勁緊的味道減少，且字體大小變得更為均整；〈太室石闕銘〉原碑仍有篆意，錢泳臨書已不見；再如〈乙瑛碑〉、〈禮器碑〉等漢隸名品，原碑用筆方圓並濟，錢泳臨書多圓弧筆畫、多提按動作，整體卻稍嫌規整而缺乏變化。這種特色在明代的隸書家作品中亦可見到，現代學者黃惇將此現象歸因於當時學書「師碑必師名家」，因而特別喜愛傳為梁鵠、鍾繇等人所書的〈范式碑〉、〈上尊號奏〉等。[75] 錢泳早年由明人隸書入手，可能亦受此影響，由這類作品中建立了筆法及結字的基礎，後來雖廣泛學習其他漢碑，卻已難跳脫原有框架。此外，錢泳又以己意補全磨滅不清的字，更使得全帖顯得整齊。

今天我們受惠於發達的影印出版技術，得以輕易看到各種漢隸樣貌，難免對錢泳的臨書表現感到不足或不滿，然當我們回顧清代金石篆隸之學的發展，此帖最重要的意義在於，它統整了當時訪碑、考碑與研究漢隸的最新成果，再進一步運用臨古與刻帖出版的形式，使之成為有系統且易於入手的書法學習典範。臨古與叢帖刊刻為十九世紀重要的書學風潮，《攀雲閣帖》在此脈絡中佔有什麼位置？以下即針對此點進行討論。

三、清初以來的書法臨古與刻帖

《攀雲閣帖》的編纂及臨書表現與晚明以來的書法臨古風尚有密切的關係。錢泳臨50餘種漢隸卻風格均整一致，皆成己樣，或可理解為董其昌倡始之

[75] 黃惇，〈漢碑與清代前碑派〉，《中國碑帖與書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頁29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臨古」重神會不重形似，以展現個人詮釋為主之觀念的展現；而另一方面，如此大規模的成套臨古冊又是趨古風尚下，力追古代典型，對「古」代書法教材需求提升之下的產物。這二者對了解《攀雲閣帖》的真正意義缺一不可。

學者朱惠良針對董其昌的書法臨古觀與實踐曾作過詳細的論述，她認為董其昌的臨古觀有兩個特點：一是強調參合其他相關書蹟之筆意，探原以求神韻，二是認為臨古的目標在於求書家的自性本相，不被古人所籠罩。如此一來，即便是臨古，亦如同自運一般，突破了臨古僅是學習書法的途徑而已之舊有觀念，對後世影響甚大。朱氏並認為，在董其昌的影響之下，清人的臨古作品特別多，且強調自出新意、不求形似，變消極的臨仿而為積極的創作。⑯ 董其昌對清人臨古的影響毋寧極為關鍵，但是以「出新意」來理解並評價其臨古的作為與表現是否貼切，則可進一步商榷。瀏覽清代書家的活動與作品時會發現，雖然諸家有不同的表現，但在反覆回到古代典型、尋求更深切理解的背後，實是對「古」的高度崇敬。

清代書家這種追古的心態與實踐與同時期的山水畫家有相當程度的對應。學者石守謙在關於明清山水畫的討論中曾提出，董其昌推動下以「復古」為核心主軸的山水畫中，「復古」不僅是手段，也是目標，雖然個別畫家的具體表現有所不同，但皆是與前代大師產生共鳴，一同體悟「道」的呈現。⑰ 石氏並將繪畫中的臨古比作歷代學者的《四書》集注，重點在於闡述與詮釋，而非提出前所未有的創見。⑱ 與這種「述而不作」的臨古觀相為表裡的，還有董其昌提出的「集大成」主張，在這些概念籠罩下，「古」成為最重要的主題，各種看似相異的表現都應視為此一主旋律的變奏。

這種看法對理解清代的書畫臨古表現，尤其是董其昌影響仍十分明顯的清

⑯ 朱惠良，〈董其昌書法藝術〉，《董其昌法書特展研究圖錄》（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1993），頁6-38。

⑰ 石守謙，〈對中國美術史研究中再現論述模式的省思〉，《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報》，第15期（1997），頁23；並參見石守謙，〈以筆墨合天地：對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6期（2009年3月），頁4。

⑱ 石守謙，〈對中國美術史研究中再現論述模式的省思〉，頁23-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期以前，頗為重要。正由於「臨古」的積極意義與重要性提升，對此時期的書畫家而言，廣泛學習古代大師的風格變得必要而迫切，展現對書畫史的了解亦成為必備之能力；在這種情形之下，「臨古」雖不只是手段與途徑，就書畫學習的手段與途徑而言，它卻較過去更為重要。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才能理解為何清代有大量畫譜、課圖稿及《小中現大》縮本的製作；[79] 而書法家對古代典範的追求較畫家有過之而無不及，摹刻前人作品的刻帖出版事業在清代進入鼎盛時期，[80] 見多識廣的成名書家並經常以課子或課徒之名，將自己的臨古書法集結成有系統的教材。

清初以來即有大規模、系統性的成套書法臨古傳統，康、雍年間的帖學考證與書學家王澍（1668－1739）曾作《積書巖帖》60冊（作於1725－1729年間），內有臨歷代金石法帖以至宋人書共385帖（圖36-1、36-2），並有170餘則題識，內容包括源流考述、書家辨別、內容考釋、書風分析、臨習心得、真偽鑒別與刻本比較等。[81] 王澍在〈積書巖臨古帖自題〉中詳細敘述了書寫此套冊頁的始末與目的，因內容頗能說明此時期成套臨古冊的特性與問題，所以錄全文於下：

> 僕自十歲學時，拈筆便喜模古，每得古人一帖，精心模之，必求甚似乃已。嘗效唐人雙鉤〈蘭亭〉，對日視之，無筆痕墨跡，至今尚有數十本在人間也。中年衣食於奔走，不得時時繼學，然中心藏之，無刻廢離。自

---

[79] 《小中現大》縮本是將宋元山水畫全幅鉅細靡遺縮臨為易於展閱、隨身攜帶的冊頁形式，在十七世紀時最為流行。最著名的是王時敏於1627－1636年間製作的《小中現大冊》（現藏臺北故宮），收錄二十二幅宋元名畫的縮本，其中十八幅的對頁有董其昌所書之鑑定意見、畫風評述與流傳經過，此冊頁對正統派繪畫典範的建立及風格傳承有極重要的作用。參見王靜靈，〈建立典範：王時敏與《小中現大冊》〉，《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4期（2008年3月），頁175-258。

[80] 刻帖事業在清代經歷了史無前例的長足發展，不論數量或多樣性都非常可觀，關於清代刻帖的概況，見王靖憲，〈清代叢帖綜述〉，《中國法帖全集》，第14冊（武漢市：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頁1-46。

[81] 參見何傳馨，〈王澍《積書巖帖》及其書學初探〉，收入莫家良、陳雅飛編，《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8），頁425-4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入京華，淹留一十四載，以紙素索書者踵接於門，多以古帖酬之。性好汲古，頗富鑒別聲，凡以名跡佳搨來者必以示，余力不能蓄，輒鉤模之，多蓄古紙。歸裝無別儲，惟古搨三十種，舊紙數百番而已。歸來杜門掩關，塵事都盡，日取所蓄紙，臨模古人，有不自得即便廢去，兩年以來所臨凡幾千紙，上自周秦，迄於唐宋，篆隸草章行楷無不畢具。臨已，即付從事孫龍裝之，題曰：《積書巖臨古帖》，以示兒子稻孫，永為楷則。余貧薄無田宅可遺兒子，以此畀之，他日長成能學父書，守之勿失，即不能，猶可作活計。擇於斯二者，一聽兒子，老夫復何有焉。

曩在京師，老友蔣拙存（名衡，1672－1743）從關中遺余書云：「自入秦來，得見晉唐名跡數十百種。」詞氣激揚，若甚自得者。余復之曰：「承老友以見多傲我，吾入京十四年，所見計十倍老友，但不知何時得相從二泉九峰間，酌泉作書與老友鬥勝否？果得爾，故是人生第一樂事。」比余還二泉，而拙存已先我十日至，拙存鼓掌狂喜，出秦中所模三百六十種示余，余為篆題其顛曰：《拙存老人臨古帖》，且為之贊，有「此事英雄，使君與孤」之語，蓋心折拙存，亦引以自負也。他日余謂拙存：「吾子所模富，信僕所未見僅十之一二耳，曩以吏事荒忽，不得親筆研，今歸老投閒，此復何有。」兩年以來，所臨果千餘種，拙存每見每狂叫也。吾兩人相期鬥勝在甲辰（1724）之冬，其先拙存病於寓齋，病且死，死而復甦，既癒，自燕之秦，自秦至錫山，而余亦果如期至。兩年中吾兩人每臨一書已，必相從質證，酌泉賞奇，殆無虛日，五年前語今果踐之，天之所假，豈虛也哉。[82]

王澍的臨古範圍自周秦迄唐宋，篆隸草章行楷皆備，規模宏闊，且以肖似為目標，能掌握數量如此龐大、風格如此懸殊的古代法書實令人驚歎。王澍本人對此十分得意，不僅以之與老友蔣衡相期鬥勝，且欲傳於兒子，永為楷則。他預想此套冊頁將於兩方面裨益於兒子：一是作為臨習典範，助其繼承家學，二是「即不能，猶可作活計」，幫助生計。後者尤耐人尋味，除作為名書家王澍真跡的價值外，此帖或亦具有書法教科書的潛在商業利益。雖然《積書巖帖》在十八世紀未曾上石刻帖，但墨跡本卻有數種，臺北故宮收藏有一套，

[82] 王澍，《虛舟題跋》，卷12，頁485-489；轉引自何傳馨，〈王澍《積書巖帖》及其書學初探〉，頁427-42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亦見於近幾年的藝術拍賣市場。[83] 這幾種墨跡本之間的關係有待進一步確認，應考慮王氏家族傳摹複製此帖的可能，畢竟收羅如此廣泛，又有王澍的識語辨明書學源流、分析書風、提點臨書要領，對於有志學書者具備很大的實用性。

王澍自題中提到蔣衡（字拙存、湘帆，江蘇金壇人，1672－1743）亦有成套的臨古帖，內為秦中所模360餘種，王澍為之篆題並贊。翁方綱（1733－1818）所撰〈金壇蔣氏三世合傳〉提及蔣衡有《拙存堂臨古帖》366種，即此帖，此外並有《續帖》及〈再生人臨古帖目錄〉，顯見其對書法臨古事業的投入。[84] 王澍與蔣衡相以見識廣、模帖多鬥勝，王澍的贊語「此事英雄，使君與孤」頗有兩人所為冠諸天下的自負意味。誠然當時書家廣泛臨古，並以臨古為自運的作法已是普遍的風氣，但王澍與蔣衡的系統性、大規模的成套作品，的確與一般的臨古有些許差異，他們更展現出對「古」的歷史性考察的興趣，甚至有建立完整書史體系的企圖。

錢泳堪稱十九世紀繼承王澍與蔣衡傳統的代表人物，雖然當時著名書家皆不乏臨各家法帖，但大多具較明確的針對性（如王羲之書、宋四家書、董其昌書或《淳化閣帖》等），涵蓋的古代典範範圍、數量皆有限，惟有錢泳在廣度與規模上能與王澍等人相提並論。在《攀雲閣帖》之外，錢泳還有一系列的臨古作品，涵蓋周秦、漢、晉、唐、宋、元、明各代，如他的《寫經堂帖》8卷（1815）起於鍾、王，終於趙孟頫；《問經堂帖》4卷（1816）臨漢魏隸書數十

---

[83] 近幾年拍賣市場上所見之《積書巖帖》有：（1）2004年，上海崇源拍賣品公司，一套60冊，蘇州王大隆（1901－1966）舊藏；崔爾平，〈積書巖摹古帖賞析〉，《藝術市場》2004年第7期，http://liujy.cangnet.com/html/200509/2005092014335662.html（2010-06-11檢視網頁）；（2）2005年，中國嘉德秋季拍賣會，一套60冊；（3）2005年，北京瀚海秋季拍賣會，八開；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192-956579.shtml (2011-06-11檢視網頁)；（4）2007年，西泠印社秋拍，一套60冊，蘇州王大隆（1901－1966）舊藏；http://www.xlysauc.com/results/2007nianqiupai/zhongguoshuhuagudaizuopinzhuanchangqingdai2007qiu/2008-12-23/7941.html (2011-06-11檢視網頁)。第（1）、（2）與（4）為同一套，曾為蘇州王大隆收藏。第（3）為殘冊，與其他的關係尚待釐清。

[84] 翁方綱，〈金壇蔣氏三世合傳〉，《復初齋文集》卷13，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李彥章校刻本）。另參見余集，〈蔣湘帆先生傳〉，《秋室學古錄》卷5，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刻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種；《述德堂帖》8卷（1818）臨唐至元諸家；《述德堂枕中帖》4卷（1822）臨晉至明諸家書20餘種；《縮本唐碑》32卷（1824）臨唐碑百餘種；及《學古有獲之齋帖》4卷（1828）臨鐘鼎款識並周、秦、兩漢、魏、晉、六朝及唐各代書，共70餘種；其他還有〈蘭亭序〉數十本、〈石鼓〉、〈嶧山碑〉、〈琅琊刻石〉等十數種單帖。[85] 錢泳的這些臨古帖都刊刻成法帖出版，流通量與影響較王澍更進一步，而其主觀上欲樹立對「古」之理解的權威亦十分明顯。這裡不能不再談到董其昌運用刻帖以提升書名、建立權威的前例，及其在清代造成的影響。

私家刻帖在晚明極為風行，且除摹刻古代法書，亦開始以自書入帖，關鍵人物即為董其昌。董其昌及其家族自萬曆晚年起陸續以董書刊刻了一系列法帖，包括《寶鼎齋法書》（1609）、《書種堂帖》（1614）、《書種堂續帖》（1617）、《來仲樓法書》（1622）與《汲古堂帖》（1630）等，除為簡應酬，亦意圖藉此揭示董其昌的標準書蹟，以摒除流通於市面上的偽蹟與偽刻，並進一步由此穩固董其昌的個人書名與權威。[86] 在這些董書刻帖中，有極大部份是他的臨古作品，如此一來則帖中所宣揚的不僅是董其昌的書法，還包括他所認可的古代法書典範。

這種結合臨古與刻帖，同時宣揚個人書法與書學認知的做法在清代蔚然成風，在錢泳的交遊圈中，成親王永瑆（1752－1823）、鐵保（1752－1824）、潘奕雋（1740－1829）等人皆多此類刻帖，許多還是經錢泳之手鐫刻（如永瑆的《詒晉齋法書》及《詒晉齋巾箱帖》）。這些刻帖中的臨古對象以《淳化閣帖》中的晉唐諸家、二王，還有米芾、趙孟頫及董其昌等人的行草書與小楷為主，基本上恪守「帖學」的傳統。錢泳的《攀雲閣帖》在形式上屬當時流行

---

[85] 錢泳，〈家刻〉，《履園叢話》，九，頁258-260。《問經堂帖》、《述德堂枕中帖》、《學古有獲之齋帖》（或稱《學古齋四體書刻》）在《叢帖目》中錄有帖目，見容庚，《叢帖目》，第四冊，頁1741-1743、1749-1751、1751-1753。

[86] 日本學者增田知之對此曾作過考察，他認為這一連串的董氏刻帖與傳統的法帖概念有極大的差異。傳統上法帖以集刻歷代書蹟為主，多誇耀收藏豐富、摹刻精妙，能裨益學書者；董氏刻帖則全為董其昌個人宣傳。董氏刻帖原為抑制贋作，出版後反助長偽刻，結果又必須再集刻新帖，而董其昌個人的書名在大量作品流通、真偽鑒別的過程中更加穩固，也由此建立權威。見增田知之，〈董其昌法帖刊行事業見權威確立構想〉，《史林》，91卷5號（2008年9月），頁783-8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臨古刻帖範疇，然在內容上卻大有突破，它是第一部以石刻漢隸為內容的大規模刻帖，不僅拓展了傳統刻帖的內涵，也是錢泳企圖以金石碑版的新材料，建立一個足與傳統書學典範並駕齊趨的系統之展現。

四、「金石學」、「碑學」與「帖學」

《攀雲閣帖》在嘉慶晚期的出現還牽涉到此時期「金石學」、「碑學」、「帖學」之間消長與相互關係的重要書史問題。

「金石學」是研究古代青銅器與石刻的形制發展、銘文內容考訂之學，「碑學」則以金石媒材上的銘文書法為關心重點，包括書法美學實踐與源流派別考察。「金石學」先盛於十一世紀，再於十八世紀時隨著訓詁、考證學之興而獲得長足發展，接續而來的是書學家自金石碑版上的古代字體汲取靈感，進行藝術創發。以金石碑版為取法對象的書學即泛稱「碑學」，重視篆、隸，與師法《淳化閣帖》等法帖，以二王行草為基調的「帖學」形成對比，清中期以後大盛，扭轉了北宋以來八百年的書學主流，並隨著各種古代書法材料持續出土，直至二十世紀仍極為興盛。「碑學」與「帖學」的典範轉換，及「金石學」到「碑學」的過渡，是清代書法史最受關注的問題。康有為（1858－1927）在《廣藝舟雙楫》中稱「道光之後，碑學中興」，而「碑學」之興除「　帖學之壞，亦因金石之大盛也。」[87] 現今學界一般認同這樣的看法，將「金石學」過渡到「碑學」的時間訂在嘉、道之際，而此後「碑學」大盛，取代「帖學」的主流地位。[88]

---

[87] 康有為，〈尊碑第二〉，《廣藝舟雙楫》，收入《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頁755。

[88] 參見神田喜一郎，〈中國書道史14 清二〉，神田喜一郎等編著，洪惟仁等譯，《書道全集》，第14卷（臺北市：大陸書店，1989），頁1；廖新田，《清代碑學書法研究》（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1993）；劉恆，《中國書法史 清代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頁199-200；陳雅飛，〈從金石學到碑學—以十八世紀晚期幕府學術圈為中心〉，《合璧聯珠二—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2007），頁31-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已是書法史教科書中的既定論述，然而典範轉換間各種因素究竟如何交互作用，我們卻仍未有具體而全面的掌握。在眾多疑問中，有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即書學家面對數量龐大的新出石刻書法時，如何統整與消化？更進一步，他們如何處理新材料與原有的書學傳統之間的關係？《攀雲閣帖》的例子或能提供有用的觀察。

《攀雲閣帖》的編集無疑與碑版考證的關懷有關，錢泳不但採取編年的方式，且不拘於名品，廣納殘石與罕拓，力求全面呈現漢隸的樣貌，明顯受到了黃易、翁方綱等金石學者蒐集與整理漢碑的影響。然而，錢泳在字形呈現、碑文內容選取等方面卻顯現出與黃、翁等人不同的興趣。在「金石學」的研究中，碑拓年代或真偽的判斷是考察重點之一。這類研究倚賴對拓本泐蝕缺損等細節的考察，黃易等金石學者因此重鈎摹多於臨寫（黃易曾將家藏十種重要拓本雙鈎刊為《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翁方綱則幾乎每見一拓本即鈎摹備查）；同時還著重校讀、考證銘文內容，以及審視拓本遞藏。錢泳在《攀雲閣帖》中則首重呈現清晰的漢隸字形，突顯（甚至誇大）八分書的開張撇捺與波磔特色，而節選碑文段落亦背離內容考釋的關懷。此帖由考碑的成果而來，卻是以書法臨習為最重要的目的，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清中期「金石學」轉化出「碑學」的發展過程。

這個轉化的過程自然並非跳躍而是漸進的，過程中還時時可見雜糅及並存的現象。錢泳興趣廣泛，又多技能，本身即跨足不同領域。除了書法藝術，錢泳事實上亦關心漢碑的形制與原碑文行列安排，他的《縮本漢碑》即是這方面的具體表現，與《攀雲閣帖》適成對比。

《縮本漢碑》又稱《縮臨漢碑》、《縮模漢碑》或《小漢碑》，縮摹漢碑全形。上海圖書館現藏有錢泳《縮本漢碑》碑目與考釋稿本，可知其整體規劃：共有五十八種漢碑，分為「見存之碑」（40種）、「已佚之碑」（10種）、「補刻之碑」（4種）與「擬刻之碑」（4種）四類。[89] 然錢泳年譜道光二十一年（1841）條下記：「刻而未完者，有縮模漢碑若干冊。」[90] 可能直至錢泳去

[89] 此目亦收入《寫經樓金石目》中。錢泳，《縮本漢碑》，上海圖書館藏稿本；錢泳，《寫經樓金石目》，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抄本，無頁碼。

[90] 胡源、褚逢春編，《梅溪先生年譜》，頁4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1844年）前都尚未全部完成。就筆者目前所知有兩套錢泳《縮本漢碑》：一為2009年6月西泠印社拍賣公司拍賣之《縮拓本漢碑三十八種》，乾嘉間監生李榮舊藏；⑨① 二為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高蘊琴（名伯昂，廣東汕頭人，活動於二十世紀初）舊藏之《錢梅溪縮臨漢碑三十四種》影印本。我們可由這兩套一窺其概況，只是這兩種版本彼此還有許多不一致之處，其間關係尚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據西泠印社拍賣公司提供的資料，《縮拓本漢碑三十八種》的每一碑拓片約高56公分，寬33公分，這大約是一般漢碑的1/3高度，錢泳在這小空間中摹出漢碑的完整形狀，連同碑額裝飾與篆題、碑文行列、隸字及碑身斷裂缺損處一併呈現。這些細節需有充足的考證作基礎，尤其是在古碑已毀、整拓難得的情形下，更能顯現主事者的淵博見識及考碑功夫。這種對古碑描圖繪形的做法與乾隆元年（1736）褚峻與牛運震的《金石經眼錄》（圖37）極為近似，⑨② 然褚、牛二氏之書僅記錄曾訪得之尚存古刻，錢泳的「見存」、「已佚」、「補刻」、「擬刻」等四大類別顯示，他還試圖藉由傳世拓本或著錄記載，來重建已不存之碑。錢泳在「已佚之碑」的重建方面，有的據曾寓目的整拓本，如〈圉令趙君碑〉應參照了錢大昕藏本（圖38）；⑨③ 有的據當時金石學者考證後的重立碑，如〈華山廟碑〉應是參照道光四年（1824）錢寶甫的重刻本（圖39）；而〈玄儒先生婁壽碑〉（圖40-1、40-2）、〈夏承碑〉（圖41-1、41-2）、〈柳敏碑〉（圖42-1、42-2）等的碑首與碑身設計則可能參考了南宋洪适《隸

⑨① 見博寶拍賣網 http://auction.artxun.com/paimai-21630-108145031.shtml（2009-12-03檢視網頁）。

⑨② 褚峻摹圖，牛運震說，《金石經眼錄》，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四，文淵閣四部全書電子版。關於《金石經眼錄》（後於乾隆十年又增補為《金石圖》），可參見Lillian Lan-ying Tseng, "Between Printing and Rubbing: Chu Jun's Illustrated Catalogues of Ancient Monum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pp. 255-290.

⑨③ 著錄中此碑整拓本僅有兩本，一為黃易收藏，另一為錢大昕收藏，錢泳於此兩本都曾寓目。筆者不曾見錢大昕本，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的拓片收藏中則有黃易本的全幅影印，可得知其樣貌。《縮本漢碑》中的此碑縮摹與黃易本明顯不同，所據應為錢大昕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續》中的碑圖。⑭

金石著錄自宋代以來即有繪圖的傳統，然傳統上「金」多「石」少。十八世紀以後隨著出土碑刻增多，考證日益深入，以圖示石在著錄中亦逐漸增加。翁方綱的《兩漢金石記》（1789）、黃易的《小蓬萊閣金石文字》（1800年左右）與阮元的《華山廟碑考》（1810年左右）等皆有以圖示碑文行列安排的做法，而嘉慶至道光年間還風行圖繪碑額樣式與漢畫像石，有馮雲鵬、馮雲鵷（活動於十八世紀晚期、十九世紀前期）的《金石索》（1820－1822）與劉喜海（1794－1853）的《金石苑》（1846－1848）等例。錢泳《縮本漢碑》的原型或本於乾隆初期的《金石經眼錄》，其在內容上的擴充則倚賴十八世紀晚期至十九世紀這些愈趨細膩深入的考證，再次顯示錢泳與金石考證學的淵源。

而另一方面，錢泳的《縮本漢碑》應當還具有玩賞性質。豐碑巨石被原樣縮小於案頭，巧妙的手法及尺寸的落差能為觀者帶來視覺與智識上的樂趣。史上自宋代始即有縮刻法書名品以為賞玩的例子，最著名的是南宋賈似道縮刻的〈玉枕蘭亭〉。在硯石上縮刻碑版亦可早至宋代；⑮ 明代顧從義（字汝和，號硯山山人，松江人，1523－1588）、清乾隆皇帝則都曾縮刻石鼓硯；⑯ 阮元好收藏硯石，亦好此道，曾在嘉慶初年刻〈華山廟碑〉的缺字於一巨硯。⑰ 錢泳早年可能自蘇州陸紹曾處習得蠅頭細書及製作古碑縮本的技術，⑱ 在1786年為阮元以蠅頭小八分書刻〈御製淮源記〉於端硯腹，又曾縮刻〈龍門十品硯〉，⑲

⑭ 洪适，《隸續》，欽定四庫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⑮ 〈漢故繁陽令楊君之碑〉縮臨硯刻，據推測為宋代所刻，見http://xxcb.rednet.cn/show.asp?id=594192（2009-11-05檢視）；http://www.bttp.net/ys/ys011.htm（2009-11-05檢視網頁）。

⑯ 顧從義石鼓硯現藏天津市藝術博物館，參見徐寶貴，《石鼓文整理研究》下（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1506-1512。關於乾隆皇帝對石鼓的考證、重刻與縮刻相關活動，參見侯怡利，〈聖主明君的形塑與文物的再詮釋—論乾隆重刻石鼓〉，《故宮學術季刊》，第27卷第4期（2010年夏），頁75-120。

⑰ 周長源，〈阮元摹刻《西嶽華山廟碑》和摹補碑中缺字的巨硯〉，《文物》，1992：8，頁86-89。

⑱ 關於陸紹曾善蠅頭細書八分書及製作古碑縮本，參見注11。

⑲ 錢泳縮刻之〈龍門十品硯〉原為阮元的收藏，《龍門十品硯譜》曾經日本學者宇野雪村收藏，見宇野雪村，〈金石縮摹硯雜記〉，《書論》，第14號（1979年春），頁62-65，圖版16-25。

臺灣博碩士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這種結合考證與玩賞的技藝絕不陌生。而大約與錢泳的《縮本漢碑》同時，還有江西南昌人萬承紀（字廉山，1766－1826）主持製作《百漢碑硯》（1823－1829），將縮刻作為文人學者「智性娛樂」對象的潛能充分發揮。萬承紀倩請當時的摹刻名手王應授（字子若，太倉人，王原祁玄孫，1788－1841）在近百方端溪硯背縮刻漢碑，剝落闕損，點畫撇捺，毫髮不爽（圖43）。[100]

由前述這些例子能看到，十八世紀以來的訪碑、考碑與校碑的活動及成果滲透到了十九世紀視覺文化的許多方面，時人對「古」的喜好與挪用亦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01] 在這樣的時代脈絡之下，以金石銘刻書法為依歸的「碑學」亦可理解為「好古」表現的一個層面，而非全然是對「帖學」傳統的反動。在「碑學」初興的十九世紀前期尤然 ，我們觀察到的其實是兩種書學傳統的整合多於對立，錢泳在《攀雲閣帖》中嘗試以臨古與刻帖的舊方法來統整新材料，即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前文提及錢泳似乎企圖以金石碑版的新材料，建立一個足與傳統的書學典範並駕齊趨的系統，但其實對他來說，這兩種系統並不衝突，二者皆為書史發展的軌跡，值得同等對待。他先以《攀雲閣帖》十六卷建立起漢碑的體系，在往後的刻帖中則逐步實踐兩路並重的理想。嘉慶十八年（1813）錢泳寓施淦（字秋水，紹興人）的吳門住所二十餘日，縮臨碑銘、前人法書，連同自運作品20餘種，三年後（1816）施淦據之刻石，刊成4冊，是為《問經堂帖》（圖44-1）。此帖尺寸較一般刻帖為小，版高20公分，寬僅有7.5公分。這種小型的

---

[100] 《百漢碑硯》的相關討論見宇野雪村，〈金石縮摹硯雜記〉，頁57-66；杉村邦彥，〈百漢硯碑追蹤〉，《書論》，第14號（1979年春），頁67-79；蔡鴻茹，〈王子若《百漢碑硯拓》〉，《文物》，1997：9，頁76-83；劉祿山，〈龍蛇郁律端溪石，風月蕭條董井苔—百漢碑硯及百漢碑硯拓〉，《收藏家》，2009：11，頁39-44。原硯已散失，日本學者宇野雪村稱曾於昭和二十四、五年（1949－1950）間見之，見宇野雪村，〈金石縮摹硯雜記〉，頁58。筆者搜尋網路發現〈鄭固碑〉硯尚存世，見 http://blog.artron.net/space.php?uid=1814&do=blog&id=128763（2010-01-15檢視網頁）。至於拓本，光緒十九年（1893）有石印本，民國二年（1913）又有重印本，臺灣藏家于華峰並於1980年將全套影印出版，見《百漢碑硯》（臺北市：學海，1980）。

[101] 關於清代視覺文化（尤其是工藝）中的仿古風氣，近年學界已有較多的探討，可參見李玉珉主編，《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帖稱為「巾箱本」，特別便於攜帶，是清代刻帖的新形式。[102] 除漢代碑刻與銅器銘文，此帖還收入錢泳臨王羲之〈蘭亭序〉與〈奉橘帖〉（圖44-2），碑學與帖學典範共存並行。道光八年（1828），錢泳又刻《學古有獲之齋四體書刻》，更加完整地顯現這種書史觀。此帖分為篆、隸、真、草4卷，自鐘鼎款識并周、秦、兩漢、魏、晉、六朝以及唐代諸書共73種（篆書18種，隸書15種，真書23種，草書17種），各摹數字。帖後錢泳自識：

> 今世之所謂四體書者，篆隸真草而已。篆有周秦之異，隸有漢魏之別，真分南北，草盛二王，其間授受淵源，各相沿習，惟有金石遺文可以證之。因仿書一二，以此課孫，不直一笑也。句吳錢泳記。[103]

這段辨明書史演變的文字令人不禁想起阮元著名的〈南北書派論〉。錢泳的確受〈南北書派論〉啟發甚深，他於嘉慶十九年（1814）三月至淮陰謁見阮元，獲見示此論後大為折服，評為「真為確論」，並在《履園叢話》中抄錄了大段文字。[104] 阮元的〈南北書派論〉起首即揭明主旨為溯書法源流：「元謂：書法變遷，流派混淆，非溯其源，曷返于古？」接著說明漢末、魏、晉之間，隸字變為正書、行草，以及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正書、行草分為南北兩派的發展，並強調「二十年來留心南北碑石，證以正史，其間蹤跡流派，朗然可見。」[105] 錢泳識《學古有獲之齋四體書刻》則謂刻此帖是為闡明書法的「授受淵源」，識語中「真分南北」、「草盛二王」，還有引「金石遺文」以證之等的論點及用語皆明顯取自阮元。帖中所收作品則具體顯現這種觀點，例如第三

---

[102] 嘉慶丁卯（1807），錢泳為成親王永瑆刻《詒晉齋巾箱本》，曾述「巾箱」一詞由來：「泳既刻詒晉齋主人書十六卷，復取吉光片羽刻為此帖，用《南史》〈衡陽王傳〉中語，名曰『巾箱』。自《淳化》、《大觀》、《絳》、《潭》諸帖以來，從未有小本而成部者。刻成之後，海內風行，翻版紛紛至十餘部，……。」容庚，《叢帖目》，第4冊，頁1719-1720。

[103] 容庚，《叢帖目》，第4冊，頁1753。

[104] 錢泳，《履園叢話》，頁288-289。

[105] 阮元，〈南北書派論〉，收入《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8），頁629-635。關於錢泳著作中顯現的書學思想，及與阮元〈南北書派論〉的比較，可參考張勝利，〈錢泳《書學》研究〉，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冊收真書23種，兼顧南北，北魏高湛碑亦在列。[106] 與阮元不同的是，錢泳此帖在範圍上進一步擴及周、秦、兩漢的早期書史，意欲整合他一生鑽研金石篆隸、楷書與行草的心得。前文提及的清初王澍《積書巖帖》（作於1725－1729年間）雖亦兼收各體，但在所臨385種古帖中，只有14種為古文篆隸（古文碑帖11種，漢碑3種），與錢泳均衡呈現各種書體非能同日而語。

錢泳的前述幾部刻帖不僅拓展了傳統帖學的內涵，也標誌著金石碑版正式被納入書學體系中。此後，以金石書法入帖在嘉慶晚期與道光年間頗為風行。嘉慶二十五年（1820），北平蔡廷賓編集《寶漢齋藏真》，據翁方綱所藏罕見漢碑拓本或鈎摹本9種上石。[107] 福建同安書家呂世宜（字可合，號西邨、不翁，1784－1859以後）尤其熱中此道，他大約在道光十七、八年間（1837－1838）渡海到臺灣，館於板橋林家二十餘年，號稱臺灣金石學導師。[108] 呂世宜一生有多種臨漢隸刻帖，規模較大的有道光十一年（1831）的《四十九石山房刻石》，內收近60種臨西漢至晉石刻與銅器隸書銘文（圖45），[109] 以及道光十八年（1838）與二十五年（1845）兩次刻成的《有是樓刻石》，收50餘種縮臨金石篆隸。[110] 在這兩部刻帖中，呂世宜傾力展現各碑相異的書法特色，但亦時出己意，就此點而言與《攀雲閣帖》精神一致。但錢泳「惟有金石遺文可以證之」的態度使他尊重書史發展的先後，且臨書多有所據（即使是後代重刻之碑，亦自拓本或鈎摹本而來），呂世宜則似乎缺乏以刻帖建構書史的興趣，帖中的臨書篆隸錯雜，順序安排完全無關碑銘年代先後，重點更在呈現金石材料富有之活潑而多樣的書風。

---

[106] 嘉慶四年（1799）時錢泳曾縮臨唐碑，阮元觀後即建議他訪山東孫星衍，補足北朝碑刻，以了解唐楷淵源。這些縮臨唐碑後來於道光元年至二年間（1820－1821），由歙縣鮑崇城刻成《縮本唐碑》三十二卷，道光四年（1824）完成，阮元、翁方綱、孫星衍等人跋亦皆收入。錢泳校訂，《梅溪先生年譜》，頁374-375，嘉慶四年（1799）條下；容庚，《叢帖目》，第4冊，頁1529-1542。

[107] 容庚，《叢帖目》，第4冊，頁1355-1360。

[108] 吳守禮、林宗毅編著，《呂世宜西邨先生研究資料—附呂世宜年譜》，乾冊（臺北：定靜堂、林宗毅，1976）。關於呂世宜的書學，參見郭承權，〈呂世宜書法研究：兼論與臺灣書壇發展之關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109] 吳守禮、林宗毅編著，《呂世宜西邨先生研究資料—附呂世宜年譜》，乾冊。

[110] 容庚，《叢帖目》，第4冊，頁1543-154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道光以後，書寫碑銘的風氣大盛，對漢碑的學習更加普遍而投入。碑學書法大家如何紹基（1799－1873）、吳讓之（1799－1879）等人皆反覆臨寫漢碑。傳說何紹基臨寫〈張遷碑〉與〈禮器碑〉達百遍以上，今天仍有弟子譚澤闓（1889－1947）所收集之〈何紹基臨漢碑十種〉傳世。[111] 然這些書家的臨寫對象多為名品，所選數量有限，尤其有清楚的個人偏好，此時已少見如錢泳般以種類全、數量多為目標的書法臨古。何紹基雖亦精金石考訂之學，但他的碑學書法實踐與學術研究的關聯較少，更著重在揀取合適的古碑典範，以發展出自己獨特的藝術面貌。如此看來，若錢泳體現了十九世紀前期，金石學轉化出碑學的過程，那麼呂世宜、何紹基等人正標誌著十九世紀中後期，碑學更進一步脫離金石學而獨立成為書法美學上之追求的發展。

五、《攀雲閣帖》的流傳與影響

既然錢泳刻《攀雲閣帖》的最重要目的是為方便臨習書法，那麼此帖是否發揮了預期的效果？可惜今天關於它的發行量與使用情形的資料非常稀少，僅由十六卷本後題跋得知它在錢泳的學生中廣為流傳觀覽，並且晚至道光十八年（1838）仍持續刊行，推測頗受歡迎。此帖亦見載於日本江戶時期由中國輸入書籍的舶載資料中，[112] 十八世紀後期至十九世紀日人在中國成批索購法帖，錢泳所刊行的各種刻帖可能在當時的碑帖市場上頗易取得。今天日本國會圖書館藏有《攀雲閣臨漢碑初至四集》16卷及《問經堂帖》4卷，應是隨著江戶時期的貿易船舶輸出到日本的，可惜渡日年代不詳，亦缺乏數量、流向等相關訊息。

值得玩味的是，《攀雲閣帖》因蒐羅內容廣泛，在二十世紀初又曾以《漢碑大觀》之名由上海的求古齋碑帖局影印出版，作為漢隸書法代表。求古齋碑帖局為無錫人周鍾麟經營之商業碑帖舖，據1927年出版的《求古齋金石書畫碑帖圖書目錄》，此書舖著力於出版裨益學書者臨習的書法教材，內容涵蓋書史

---

[111]《何紹基臨漢碑十種》（長沙市：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

[112] 參見大庭修著，戚印平、王勇、王寶平譯，《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市：杭州大學出版社，1998），頁4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的各個時代與流派，而尤以金石碑版為大宗。與《漢碑大觀》同列於目錄中的還有《鐘鼎篆籀大觀》；《魏碑大觀》初集、二集；《近代碑帖大觀》正集、續集（以十九世紀金石書家為主）；《當代名畫大觀》正集、續集；及金石字典、篆法指南等。⑬ 此時篆、隸、魏碑早已是學書者的臨習主流，加上碑學理論愈趨完備，又有如康有為《廣藝舟雙楫》中所列購碑指南，可以想見市場對成套、有系統的金石書學教材有一定的需求。此時期珂羅版照相影印術被廣泛運用於複製古書畫碑帖，舊有的鉤摹、刻帖等方法逐漸沒落，《攀雲閣帖》未再重刻，卻以蒐羅全面的漢碑「大觀」之姿，在商業碑帖出版的市場中獲得重生，發展出人意表，也非錢泳當初刊行此帖時所能想見。

除整部出售，這些碑帖亦有單行本，漢碑部份由《漢碑大觀》擇選了30餘種發行（圖46-1、46-2）：

> 敝局因求初學漢隸諸君便利起見，特將《漢碑大觀》另印單行本，材料均用上等中國連史紙，影印尤極精良，其於裝潢靡不於考究中而寓精益求精之美。茲因便利學者購單行本起見，故復擇尤分訂，定價低廉，俾便學者可任意取求也。書存無多，購宜從速。⑭

這種單帖形式特別方便學書者任意取求，然單獨成帖卻也讓漢碑脫離了書史序列；而所選擇的作品皆為名碑，錢泳蒐羅殘石遺字的金石學關懷亦蕩然不存。這種商業出版的流通極廣，臺灣書家鄭善禧（1932－）自述兒時在福建龍溪家鄉曾據此練寫隸書，⑮ 而今天臺灣、中國大陸及日本的部份圖書館還藏有

⑬《求古齋金石書畫碑帖圖書目錄》，收入徐蜀、朱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第1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⑭《求古齋金石書畫碑帖圖書目錄》，頁74。

⑮「他的父親……是善禧先生書法的啟蒙師。但只要父親不在家，善禧先生就從書櫃找了一部《漢碑大觀》，私下練寫隸書，因為隸書字體和別的字樣不同，練字較有趣。」史玉琪，〈第1屆國家文藝獎得主鄭善禧—藝術家素描〉，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網站 http://www.ncafroc.org.tw/Content/award-prize.asp?ser_no=8&Prize_year=1997&Prize_no=??&prize_file=Prize_Desc（2010-08-04檢視網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碑大觀》。⑯ 而就在二十世紀前半的廣大初學者對著錢泳的臨書臨習漢隸的同時，亦出現了批評的聲音，容庚（1894－1983）即評《攀雲閣帖》為「能得形似而頗有俗氣。」⑰ 碑帖專家張伯英（1871－1949）對錢泳的行草書臨古頗為推重，但對他的篆隸書臨古卻極不認同，曾如此評錢泳的《學古齋四體書刻》：

> ……所臨自鐘鼎文字以及碑帖，皆略摘數行或數字，工緻有餘，而古意不存。由梅溪茫然於筆法，用力甚深，盡成俗狀，徒足以悅庸目。……錢在嘉道間甚負盛名，自刻之書遍天下，殊不足饜觀者之意，乃欲以此為學者法，謬種流傳，貽誤匪淺。⑱

這樣的評價與嘉、道年間錢泳所受到的推重比較起來如有天壤之別，而《攀雲閣帖》在這超過一世紀的時間中，亦經歷了多種化身的輾轉流變：從乾隆五十四至五十五年（1789－1790）間《初刻》兩卷、11種漢碑開始，到嘉慶、道光年間擴充至五十四種漢碑，並有「八卷本」、「十六卷本」的刊行、重刻與輸往日本，再到二十世紀初《漢碑大觀》及單行本的影印發售，以及遭受碑帖專家的嚴苛批評，它一方面見證了漢碑被收納於主流書學典範的過程，同時也反映了不同時代對漢隸品味的改變。

---

⑯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即藏有一套，鈐蓋有「臺北帝國大學圖書印」及「昭和9.6.11」戳印，顯示為1934年進入臺北帝國大學（臺灣大學前身）圖書館藏。此套《漢碑大觀》在1979年曾經新文豐出版社影印出版，見錢泳摹，《漢碑大觀》，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 一般類》，第8冊（臺北市：新文豐，1979）。此外，北京中國書店於1984年亦曾出版一套《漢碑大觀》，惜未標明原藏處，見錢梅溪（泳）纂集，《漢碑大觀》（北京：中國書店，1984）。

⑰ 容庚，《叢帖目》，第4冊，頁1747。

⑱ 容庚，《叢帖目》，第4冊，頁17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結論

東漢碑刻在十八世紀的訪碑風潮下大量出土，新獲材料則在接下來的十九世紀經歷了一段統整與消化的過程。總數逾百的漢碑被仔細著錄與考證，而除了文字描述，當時的士人亦利用臨寫、雙鉤、描圖與繪形等方法，將考察成果以具體的形象記錄與呈現。在這個過程中，漢隸與漢碑的形像被廣泛傳摹複製，在書畫、刻帖、書籍出版及文房裝飾等不同載體間輾轉流變，成為清代追求「古雅」的視覺文化中的一部份。而就中國書法史的發展而言，十八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最大的變革是漢隸與其他石刻書法成為新的美學典範，史稱「碑學」，根本改變了以往以二王行草為基調的「帖學」取向。這已是書法史教科書中的既定論述，然而典範轉換間各種因素究竟如何交互作用？書學家面對數量龐大的新出石刻書法時，如何統整與消化？更進一步，他們如何處理新材料與原有的書學傳統之間的關係？這可說是掌握清代書法史最關鍵之所在。刻於十九世紀初期，由錢泳所主持的《攀雲閣帖》是第一部以石刻漢隸為內容的大規模刻帖，在法帖刊刻史與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本文除處理其版本、內容、選件、臨書風格與編集原則等基本問題，也從明清的書法臨古與刻帖、嘉慶至道光初期「金石學」、「碑學」與「帖學」交會的時代脈絡來考察它在清代書史上的意義，希望能對上述問題提供一些觀察與思考。

錢泳兼具「帖學」與「碑學」的訓練，跨足「金石學」考證與「碑學」書法實踐，出入職業刻工與學者文人圈，在面對大批令人興奮卻支離殘損的新發現石刻與藏拓時，則採用了舊有的臨古與刻帖方式來為之建立理解的架構。不論是以「帖」涵蓋「碑」或以「碑」擴充「帖」、以「舊」理解「新」或以「新」豐富「舊」，《攀雲閣帖》是十九世紀書家積極回應時代挑戰的例子，而其中所呈現的種種矛盾、模糊，或說是多元雜糅的特質，則是典範轉換過程中的常見現象，這個個案只是提供了一扇窺探的窗。最後本文討論《攀雲閣帖》的流傳與影響，尤其是在二十世紀初的商業碑帖出版中重獲新生的發展。在經歷了超過一個世紀、數個化身的流變後，此帖亦反映了漢碑與漢隸在清代書史中的意義轉變。這些都是過去以名家大師為焦點所進行的清代書法史研究所難以獲致的結果，此例亦提醒我們應將目光擴及法帖、畫譜等藝術出版品的生產與流通，才能對此時期的藝術發展有較全面的認識。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附記：本文是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碑乎？帖乎？從錢泳摹刻《漢碑大觀》談清中期碑學的發展」（NSC 96-2411-H-007 -015-）之成果。部份內容曾口頭發表於南京市書法家協會主辦之「請循其本－古代書法創作研究學術討論會」（2010年12月26-30日），簡短摘要〈錢泳與《攀雲閣帖》〉收入《請循其本—古代書法創作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2010），頁315-320，特此申明並由衷感謝與會學者的指正。《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兩位匿名審稿人提供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宋）洪适
《隸續》，欽定四庫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明）高攀龍
《高子遺書》，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清）〔？〕穎編，錢泳校訂
《梅溪先生年譜》，收入陳祖武選，《乾嘉名儒年譜》10，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頁313-352。
（清）王芑孫
《淵雅堂全集（惕甫未定藁）》，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嘉慶刻本）。
（清）王昶
《金石萃編》，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嘉慶十年刻同治錢寶傳等補修本）。
（清）史善長編
《弇山畢公年譜》，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清）朱彝尊
《曝書亭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影印康熙本）。
（清）阮元
《揅經室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四部叢刊清道光本）。
《南北書派論》，收入《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8，頁629-635。
（清）余集
《秋室學古錄》，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刻本）。
（清）胡源、褚逢春編
《梅溪先生年譜》，收入陳祖武選》《乾嘉名儒年譜》10，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頁353-426。
（清）翁方綱
《兩漢金石記》，臺北市：台聯國風出版社，1976。
《復初齋文集》，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李彥章校刻本）。
（清）張維屏輯
《國朝詩人徵略》，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道光十年刻本）。
（清）康有為
《廣藝舟雙楫》，收入《歷代書法論文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清）馮桂芬
《（同治）蘇州府志》，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九年刊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黃易
《小蓬萊閣金石目》6冊，寫本，上海圖書館藏。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76。
（清）葉廷琯
《鷗陂漁話》，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同治九年刻本）。
（清）褚峻摹圖，牛運震說
《金石經眼錄》，欽定四庫全書史部十四，文淵閣四部全書電子版。
（清）震鈞輯
《國朝書人輯略》，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光緒三十四年刊本）。
（清）錢泳
《履園叢話》，北京：中華書局，1979。
《寫經樓金石目》，抄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清）錢泳摹
《漢碑大觀》，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二輯 一般類》，第8冊，臺北市：新文豐，1979。
（清）錢梅溪（泳）纂集
《漢碑大觀》，北京：中國書店，1984。
（清）錢泰吉
《曝書雜記》，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清別下齋叢書本）。
（清）嚴可均
《鐵橋漫稿》，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道光十八年刻本）。
（清）顧燮光
《漢劉熊碑考》，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三輯，臺北市：新文豐，1986，第35冊。
《清史稿》，愛如生中國基本古籍庫（據民國十七年清史館本）。

近人論著

（日）大庭修著，戚印平、王勇、王寶平譯
1998 《江戶時代中國典籍流播日本之研究》，杭州市：杭州大學出版社。
王章濤
2003 《阮元年譜》，合肥市：黃山書社。
王靖憲
2002 〈清代叢帖綜述〉，《中國法帖全集》，第14冊，武漢市：湖北美術出版社，頁1-46。
王靜靈
2008 〈建立典範：王時敏與《小中現大冊》〉，《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4期（3月），頁175-258。
石守謙
1997 〈對中國美術史研究中再現論述模式的省思〉，《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人文學報》，第15期，頁1-2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9 〈以筆墨合天地：對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6期（3月），頁1-36。

（日）宇野雪村

1979 〈金石縮摹硯雜記〉，《書論》，第14號（春），頁57-66。

有正書局輯

1926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第1-5冊，上海：有正書局，1926。

朱惠良

1993 〈董其昌書法藝術〉，《董其昌法書特展研究圖錄》，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頁6-38。

《百漢碑硯》，臺北市：學海，1980。

（日）角井博

1976 〈宋拓の漢石經殘字—東京國立博物館新收「錢泳舊藏本」の紹介—〉，《MUSEUM東京國立博物館美術誌》，No. 309（12月號），頁4-15。

（日）杉村邦彥

1979 〈百漢硯碑追蹤〉，《書論》，第14號（春），頁67-79。

李玉珉主編

2003 《古色：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

何廣棪

2008 〈《乾隆石經》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月，頁7-17。

何傳馨

2008 〈王澍《積書巖帖》及其書學初探〉，收入莫家良、陳雅飛編，《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頁425-447。

《何紹基臨漢碑十種》，長沙市：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

吳守禮、林宗毅編著

1976 《呂世宜西邨先生研究資料—附呂世宜年譜》，臺北：定靜堂、林宗毅。

金石拓本研究會編

1994 《漢碑集成》，京都市：同朋舍。

林業強編著

1999 《漢延熹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周長源

1992 〈阮元摹刻《西嶽華山廟碑》和摹補碑中缺字的巨硯〉，《文物》，8，頁86-89。

故宮博物院編

2010 《蓬萊宿約：故宮藏黃易漢魏碑刻特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侯怡利

2010 〈聖主明君的形塑與文物的再詮釋—論乾隆重刻石鼓〉，《故宮學術季刊》，第27卷第4期（夏），頁75-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施安昌
1997 《漢華山碑題跋年表》，北京：文物出版社。
（日）神田喜一郎等編著，洪惟仁等譯
1989 《書道全集》，第14卷，臺北市：大陸書店。
容庚
1984、1986 《叢帖目》，1-4冊，臺北市：華正書局；香港：中華書局。
徐蜀、朱安莉編
2003 《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徐寶貴
2008 《石鼓文整理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郭承權
2000 〈呂世宜書法研究：兼論與臺灣書壇發展之關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伯英
2005 《張伯英碑帖論稿》，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張勝利
2009 〈錢泳《書學》研究〉，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
陳雅飛
2007 〈從金石學到碑學—以十八世紀晚期幕府學術圈為中心〉，《合璧聯珠二—樂常在軒藏清代楹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頁31-41。
2008 〈乾嘉幕府的碑帖風尚—以錢泳為視角〉，收入莫家良等編，《書海觀瀾二》，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頁147-155。
黃惇
2001 〈漢碑與清代前碑派〉，《中國碑帖與書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頁299-316。
傅惜華編
1950-1951 《漢代畫像全集》，巴黎：巴黎大學北京漢學研究所。
廖新田
1993 《清代碑學書法研究》，臺北市：臺北市立美術館。
鄧秋枚編錄
1908-1922 《神州國光集》，上海：神州國光社。
劉恆
1999 《中國書法史 清代卷》，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
蔡鴻茹
1997 〈王子若《百漢碑硯拓》〉，《文物》，9，頁76-8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劉祿山

2009〈龍蛇郁律端溪石，風月蕭條董井苔—百漢碑硯及百漢碑硯拓〉，《收藏家》，11，頁39-44。

（日）增田知之

2008〈董其昌法帖刊行事業見權威確立構想〉，《史林》，91卷5號（9月），頁783-814。

盧慧紋

2009〈漢碑圖畫出文章—從濟寧州學的漢碑談十八世紀後期的訪碑活動〉，《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6期（3月），頁37-92。

Tseng, Lillian Lan-ying

2010 "Between Printing and Rubbing: Chu Jun's Illustrated Catalogues of Ancient Monum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in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Department of Art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p. 255-2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　錢泳，〈清重立漢武氏石室題記〉，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拓本。

圖2-1　錢泳隸書題署黃易舊藏〈熹平石經殘碑〉拓本，北京故宮藏。攝自鄧秋枚編錄，《神州國光集》(上海：神州國光社，1908-1922)，第4集。

圖2-2　錢泳跋黃易舊藏〈熹平石經殘碑〉拓本，北京故宮藏。攝自鄧秋枚編錄，《神州國光集》(上海：神州國光社，1908-1922)，第6集。

圖3　錢泳、潘奕雋跋黃易舊藏〈涼州刺史魏元丕碑〉拓本，北京故宮藏。攝自有正書局輯，《黃小松藏漢碑五種》(上海：有正書局，1926)，第2冊。

圖4-1　「錢泳曾觀」朱文長方印(中)，黃易舊藏〈幽州刺史朱龜碑〉拓本，北京故宮藏。筆者攝於「蓬萊宿約：北京故宮藏黃易小蓬萊閣漢魏碑刻特展」展廳，2009年11月。

圖4-2　錢泳跋黃易舊藏〈幽州刺史朱龜碑〉拓本，北京故宮藏。攝自有正書局輯，《黃小松藏漢碑五種》(上海：有正書局，1926)，第3冊。

圖5　「台僊曾觀」白文長方印、「錢泳私印」白文方印、「立群」朱文方印，黃易舊藏〈小黃門譙敏碑〉拓本，北京故宮藏。筆者攝於「蓬萊宿約：北京故宮藏黃易小蓬萊閣漢魏碑刻特展」展廳，2009年11月。

圖6-1　錢泳跋黃易舊藏〈廬江太守范式碑宋拓本〉，北京故宮藏。攝自有正書局輯，《黃小松藏漢碑五種》(上海：有正書局，1926)，第5冊。

圖6-2　潘奕雋跋黃易舊藏〈廬江太守范式碑宋拓〉，北京故宮藏。攝自有正書局輯，《黃小松藏漢碑五種》(上海：有正書局，1926)，第5冊。

圖7　汪仁壽題署《漢碑大觀》八集封面，上海求古齋碑帖局出版，二十世紀初葉，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8月。

圖8　《漢碑大觀》內頁之錢泳像，上海求古齋碑帖局出版，二十世紀初葉，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8月。

圖9　《漢碑大觀》所附錢泳傳與第一集目錄，上海求古齋碑帖局出版，二十世紀初葉，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8月。

圖10　《漢碑大觀》第八集末版權頁，上海求古齋碑帖局出版，二十世紀初葉，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8月。

圖11　錢泳《攀雲閣帖》臨書後小字書碑名。筆者攝自《漢碑大觀》，上海求古齋碑帖局出版，二十世紀初葉，上海圖書館藏，2009年8月。

圖12　錢泳跋《攀雲閣帖》(八卷本)。筆者攝自《漢碑大觀》，上海求古齋碑帖局出版，二十世紀初葉，上海圖書館藏，2009年8月。

圖13　潘奕雋跋《攀雲閣帖》(八卷本)。筆者攝自《漢碑大觀》，上海求古齋碑帖局出版，二十世紀初葉，上海圖書館藏，2009年8月。

圖14　江鳳彝跋《攀雲閣帖》(八卷本)。筆者攝自《漢碑大觀》，上海求古齋碑帖局出版，二十世紀初葉，上海圖書館藏，2009年8月。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5　錢曰奇跋《攀雲閣帖》（八卷本）。筆者攝自《漢碑大觀》，上海求古齋碑帖局出版，二十世紀初葉，上海圖書館藏，2009年8月。

圖16　錢曰祥跋《攀雲閣帖》（八卷本）。筆者攝自《漢碑大觀》，上海求古齋碑帖局出版，二十世紀初葉，上海圖書館藏，2009年8月。

圖17　《攀雲閣帖》（十六卷本）木刻目錄，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8月。

圖18　《攀雲閣帖》（十六卷本）每冊起首處之篆書標題，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8月。

圖19　錢泳跋《攀雲閣帖》（十六卷本），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8月。

圖20　翁方綱、姚元之、潘奕雋跋《攀雲閣帖》（十六卷本），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8月。

圖21　江鳳彝、鮑崇城、浦洽文等跋《攀雲閣帖》（十六卷本），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8月。

圖22　胡源、方成、曹奕麟、華士儀、周芳容等跋《攀雲閣帖》（十六卷本），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8月。

圖23　江鳳彝跋兩本《攀雲閣帖》比較。左：八卷本；右：十六卷本。

圖24-1　錢泳臨〈孔宙碑〉，《攀雲閣帖》（八卷本）。筆者攝自《漢碑大觀》，上海求古齋碑帖局出版，二十世紀初葉，上海圖書館藏，2009年8月。

圖24-2　錢泳臨〈孔宙碑〉，《攀雲閣帖》（十六卷本），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8月。

圖25-1　東漢〈曲阜孔君殘碑〉拓片。攝自金石拓本研究會編，《漢碑集成》（京都市：同朋舍，1994），圖版89。

圖25-2　錢泳，〈集曲阜孔君殘碑字〉，《攀雲閣帖》。攝自《漢碑大觀》（北京：中國書店，1984）。

圖26-1　東漢〈孔宏碑〉（又稱〈魯相謁孔廟殘碑〉）拓片。攝自金石拓本研究會編，《漢碑集成》（京都市：同朋舍，1994），圖版169。

圖26-2　錢泳，〈集孔宏碑字〉，《攀雲閣帖》。攝自《漢碑大觀》（北京：中國書店，1984）。

圖27-1　東漢〈曲阜東關殘碑〉（又稱〈熹平殘碑〉）拓片。攝自金石拓本研究會編，《漢碑集成》（京都市：同朋舍，1994），圖版130。

圖27-2　錢泳，〈集曲阜東關殘碑字〉，《攀雲閣帖》。攝自《漢碑大觀》（北京：中國書店，1984）。

圖28-1　東漢〈元孫碑殘石〉拓片。攝自金石拓本研究會編，《漢碑集成》（京都市：同朋舍，1994），圖版172。

圖28-2　錢泳，〈集元孫碑字〉，《攀雲閣帖》。攝自《漢碑大觀》（北京：中國書店，1984）。

圖29-1　黃易舊藏〈成陽靈臺碑〉拓本，北京故宮藏。筆者攝於「蓬萊宿約：北京故宮藏黃易小蓬萊閣漢魏碑刻特展」展廳，2009年11月。

圖29-2　錢泳，〈臨成陽靈臺碑〉，《攀雲閣帖》。攝自《漢碑大觀》（北京：中國書店，1984）。

圖29-3　黃易，雙鉤〈成陽靈臺碑〉，《小蓬萊閣金石文字》。攝自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臺北縣：藝文印書館，19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30　錢泳雙鉤〈婁壽碑〉，鋟印本，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8月。

圖31　錢泳，〈臨婁壽碑〉，《攀雲閣帖》。攝自《漢碑大觀》(北京：中國書店，1984)。

圖32　錢泳，〈臨戚伯著碑〉，《攀雲閣帖》。攝自《漢碑大觀》(北京：中國書店，1984)。

圖33　錢泳，〈臨曹全碑〉，《攀雲閣帖》。攝自《漢碑大觀》(北京：中國書店，1984)。

圖34　錢泳，〈臨石門頌〉，《攀雲閣帖》。攝自《漢碑大觀》(北京：中國書店，1984)。

圖35　錢泳，〈臨范式碑〉，《攀雲閣帖》。攝自《漢碑大觀》(北京：中國書店，1984)。

圖36-1　王澍，〈臨五鳳二年磚〉，《積書巖臨古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6-2　王澍，〈臨王獻之送梨帖〉，《積書巖臨古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7　東漢〈武榮碑〉縮圖，褚峻、牛運震《金石經眼錄》。擷取自欽定四庫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圖38　東漢〈圉令趙君碑〉縮圖，《錢梅溪縮臨漢碑三十四種》影印本，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11月。

圖39　東漢〈西嶽華山廟碑〉縮圖，《錢梅溪縮臨漢碑三十四種》影印本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11月。

圖40-1　東漢〈玄儒先生婁壽碑〉縮圖，《錢梅溪縮臨漢碑三十四種》影印本，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11月。

圖40-2　東漢〈玄儒先生婁壽碑〉碑圖，南宋洪适《隸續》。擷取自欽定四庫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圖41-1　東漢〈夏承碑〉縮圖，《錢梅溪縮臨漢碑三十四種》 影印本，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11月。

圖41-2　東漢〈夏承碑〉碑圖，南宋洪适《隸續》。擷取自欽定四庫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圖42-1　東漢〈柳敏碑〉縮圖，《錢梅溪縮臨漢碑三十四種》，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

圖42-2　東漢〈柳敏碑〉碑圖，南宋洪适《隸續》。擷取自欽定四庫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

圖43　東漢〈石門頌〉縮圖，萬承紀《百漢碑硯》。攝自《百漢碑硯》(臺北市：學海，1980)。

圖44-1　錢泳，〈臨西嶽華山廟碑〉，《問經堂帖》，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8月。

圖44-2　錢泳，〈臨奉橘帖〉，《問經堂帖》，上海圖書館藏。筆者攝於2009年8月。

圖45　呂世宜，《四十九石山房刻石》拓本。攝自吳守禮、林宗毅編著，《呂世宜西邨先生研究資料－附呂世宜年譜》，乾冊。

圖46-1　《求古齋金石書畫碑帖圖書目錄》。攝自徐蜀、朱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第1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圖46-2　《求古齋金石書畫碑帖圖書目錄》。攝自徐蜀、朱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第1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